

燕大輓歌

——1948-1952年一所美國教會大學的「新生」與幻滅^{*}

楊奎松^{**}

摘 要

還在中共全面奪權之前，西方在中國辦有教會大學的基督教團體就已經在做撤出中國的打算了，但中共初期的溫和政策仍舊讓許多基督徒心生幻想。1950年下半年因人事權衝突和中美為朝鮮開戰，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先後被中共新政府接管。隨之而來的「思想改造」、「忠誠老實」和「組織清理」等政治運動，則為徹底取消教會大學，消除西方影響，和按照蘇聯模式重建中國的高等教育體制，開闢了道路。本文著重考察了處此背景下的燕京大學是如何被送進歷史博物館的。

關鍵詞：燕京大學、基督教、美國、中共、思想改造

* 本文承蒙兩位評審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意見，在此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1年7月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12月10日。

**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引 子

在 1926 年燕京大學正式遷至北京西郊美麗的燕園後，它作為教會大學就已經開始引人注目了。它展示給世人頗負盛名的一個形象，就是以音樂系師生為主的合唱團每年年底的聖歌演唱。每逢聖誕之日，這些燕大師生就會在校園，乃至於北京當時最具國際水準的北京飯店，舉行聖歌演唱。在電風琴伴奏和音樂系主任、美籍教授范天祥（Bliss M. Wiant）的指揮下，歌聲好似來自深山空谷，由遠而近，悠揚如天籟之音，激昂如電閃雷鳴。尤其當演唱韓德爾的《彌賽亞》時，會場氣氛肅穆，台下聽眾鴉雀無聲，上百人多聲部縱情高歌：「聖父聖母給我們生下了聖子……」，那美妙的合聲令台下聽眾如同置身於仙境之中，一時感情昇華，如癡如醉。

從 1926 年到 1949 年，隨著民國歷屆政府的干預，學校的宗教色彩已日漸淡化。但是，除了戰亂之年外，這一傳統，以及燕大受基督教大家庭觀念影響形成的親密師生關係，卻一直保持了下來。每到聖誕日，燕京大學教授的家便開放給學生們。入夜後，家家門前精心裝飾的聖誕樹閃亮著五顏六色的彩燈，迎接成群結隊喜氣洋洋的學生們。大家紛紛湧到教授家中賀節日，吃點心，歡聲笑語，其樂融融。¹

這種情況甚至延續到了 1950 年。這一年的 11 月，政府宣布出兵朝鮮，實行抗美援朝，但燕大作為美國基督教差會在華辦的最大的教會學校，聖誕仍辦得像過去一樣。當年入學燕大新聞系的學生白崇義²在回憶中就描述過當時的場景：

¹ 參見〈聖誕節在燕園〉，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cn/zhuanzhu/2001-10-09/631.html>（2009 年 8 月 30 日檢索）；〈科學與藝術的結緣之地〉，《科技時報》，2004 年 10 月 8 日；趙慶閏，〈由彌賽亞合唱團想起的〉；劉暢標，〈燕園隨想曲〉，均收入佚名編，《雄哉！壯哉！燕京大學——1945-1951 級校友紀念刊》，1994 年 4 月 16 日，頁 165-166、340。

² 白崇義，學號 50228，係新聞一班的學生。見《北京燕京大學學生名錄（1950-1951）》（1950 年 11 月印發）。

12月25日耶誕節，清早師生們便三三兩兩笑顏逐開地來到宗教樓，參加這裡舉辦的聖誕節活動。「雄哉壯哉燕京大學輪奐美且崇，人文薈萃中外交孚聲譽滿寰中……」的歌聲響徹校園中的每個角落。尤其是那首譽滿遐邇的《聖母頌》，每次聽到她都是那麼撼人心弦，都要勾起人們聖潔靈魂的顫動。下午在冰凍的未名湖上還舉行了滑冰表演和冰球比賽。晚上，許多同學被邀請到教師家中共渡聖誕良宵。³

不過，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中美走向全面敵對和戰爭，1950年的聖誕節也就成了燕京大學最後的一抹記憶了。1951年春節過後的第一個週一，這所有美國背景的私立教會學校，就被新政府接管，成為一所公立的「中國人民的大學」⁴了。又過了一年，為全面清除「美帝文化侵略」而展開的思想改造運動，不僅在燕大掀起了一場觸及每個人靈魂的政治風暴，也將這所已經堅持辦學30年，「既是成功也是失敗」的大學，⁵送進了歷史博物館。

關於燕京大學這最後幾年的歷史，不少當事人的回憶錄都曾談及他們的親歷親聞，⁶一些當年在燕大的中外教師留下的日記、書信及口述資料，也從不同角度推動了這段歷史的重建工作。⁷但是，由於燕京大學的檔案相當部分保存在北京大學的檔案室裡，始終未向社會開放，因此建立在個人資料和教會史料基礎上的任何一種史實重建都不免存在太多缺憾。好在近十多年來已經有北大師生關注到這一情況，開始查閱並利用這些檔案來做研究，本文自然也是這

³ 白崇義，〈解放初期的燕園生活〉，收入燕大文史資料編委會編，《燕大文史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輯3，頁439-440。

⁴ 〈陸校長的話〉，《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快報》，期1，1951年2月20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YJ50029/2/4。

⁵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44.

⁶ 比較著名的有巫寧坤，《一滴淚》（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7）；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8）；張世龍，《燕園絮語》（北京：華齡出版社，2005）；張大中，《我經歷的北平地下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等。

⁷ 如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陳遠，《消逝的燕京》（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范燕生（Allen Artz Wiant）著，李駿康譯，《穎調致中華：范天祥傳——一個美國傳教士與中國的生命交流》（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

種嘗試之一。⁸只是筆者的考察將較側重於研究說明，以校長陸志韋為代表的燕大人有心順應形勢卻無力改變命運的複雜原因與過程。

二、現實與選擇

燕大的終結之日，四年前就開始了。那個時候在中國的美國基督教傳教士們已經惶惶不可終日。用時任燕京大學代校務長竇維廉（William H. Adolph）的話來說就是：「軍事形勢極端緊張」，「時局悲觀」，「我們的前途漆黑一團」。⁹

面對蔣介石國民黨丟掉東北，平津乃至華北岌岌可危的情況，對中共可能像蘇聯那樣，對宗教及其政治問題實施嚴密控制的可能性，設在紐約的美國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托事部（Uni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已經憂心忡忡了。它在 1948 年 2 月給燕大總務長等人的信中就再三詢問：「如果鐵幕一旦落下，基督教大學屬於共產黨怎麼辦？」「你想如何應付共產黨政權？」「已經有多少明確的計畫，什麼計畫？」「對於共產黨沒來之前離校的人和共產黨來了也不走的人，你們做好什麼準備了，做了什麼工作？」¹⁰

幾個月之後，必須要做出抉擇的時刻終於到來了。隨著林彪的部隊大舉入關，將北平、天津團團圍住，地處北平西北城郊，毫無設防的燕京大學隨時都

⁸ 已知利用北京大學所藏燕大檔案對燕京大學最後幾年歷史做過專題研究的，先後有楊奎松，〈一位美國傳教士在燕京大學的「解放」歲月——圍繞范天祥教授的日記和書信而展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 5 期，頁 30-52；鄧陽，〈趙紫宸與燕京宗教學院——走向「三自革新」的本色化之路〉（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6 年 6 月）；張德明，〈鼎革前後的博弈與調適——1949 年燕京大學的多重面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10（2020 年 12 月），頁 111-156 等。

⁹ 〈竇維廉致美國紐約聯合托事部的信〉（1948 年 1 月），轉見董天民、李耄年、崔懿華，〈陸志韋先生傳略〉，收入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編著（下略），《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印，2006），頁 14。

¹⁰ 〈紐約聯合托事部給范天祥、梅貽寶的信〉（1948 年 2 月），轉見《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頁 14。

會落入中共之手。這時只有兩條路可選：要麼撤離，要麼留下，而燕大人做出了留下的決定。

11月26日，校行政委員會¹¹主席陸志韋就此一決定寫信告訴美國資助方之一的洛氏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稱：形勢確實十分危急，因此，委員會允許每個人決定自己或留或去。但「我個人覺得應當堅持到底，目前仍有一線可能，在不同的思想意識之間，來嘗試實行某種變通的辦法。」「大部分的中國人是肯定的要留下來的，還有一些我們的西籍教職員也會留下。」¹²

陸志韋之所以會對他們幾乎毫無瞭解的中共抱有「一線」希望，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他這時更多地不是從基督徒的立場，而是從「我天生是一個中國人」¹³的立場，來看待國共兩黨的這場歷史性的政權更迭的。12月3日，他在寫給美國基督教在華差會（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封信中是這樣解釋自己的決定的：「我是一個對於共產黨沒有政治同情的基督徒」，但現實是，民眾更傾向於同情「一個比較不腐化和比較少壓迫的政黨」。儘管對現實「我們並不存美好的夢想」，但如果我們留下來能夠有助於人道和自由在中國的存在，它對於中國，對於基督徒，對於世界和平，都會是有極大意義的。¹⁴

這時許多基督教人士都選擇離開北平，甚至是中國大陸。哪怕是一些對陸志韋和燕大人的冒險給予很高評價的人，也認定「鐵幕」正在落下。但也有些美國人認為冒這個險是值得的，比如這時美南長老會差會傳教士、也是漢學家的金陵神學院教授畢范宇（Francis Wilson Price），就托美國駐北平副領事轉信給陸志韋說：「舊約的猶太預言，新約的基督教福音，都是誕生在悲劇裡的。

¹¹ 燕京大學行政委員會成立與改組情況，見燕京大學校友校史編委會編（下略），《燕京大學史稿》（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9），頁1336、1358。

¹² 〈陸志韋致洛氏基金會法斯的信〉（1948年11月26日），轉見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新燕京社聯合出版（下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54，1952年3月13日。

¹³ 〈陸志韋給魏德邁將軍的備忘錄〉（1947年8月12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YJ49022/1/30-31。

¹⁴ 〈陸志韋致諾蘭德的信〉（1948年12月3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54，1952年3月13日。

基督教的歷史中，它的危難時期也是它的最堅強時期。」「我相信你必定會迎接考驗的。」¹⁵

陸志韋等人的期望至少在一段時間裡似乎也不是毫無希望可言的。因為中共中央這時計畫中的新制度，還是新民主主義的，不僅要「成立聯合政府，還要吸收資產階級參加」建設新中國。就連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經濟特權等等，也準備要花較長時間，用這時在中共黨內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副主席劉少奇的說法就是：「中國如果沒有突然的武裝干涉，沒有資產階級的暴動，這種過渡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¹⁶因此，中共中央 1949 年 1 月 19 日就外交問題發布的內部指示明確規定：對外國所辦私立學校的方針是「暫許其維持現狀」，只是校長必須為中國人，「學校經費，必須報告其來源；其課程，必須照其他學校的規章，同一辦理」。¹⁷

1948 年 12 月中旬，解放軍佔領了燕大周邊地區，當陸志韋因得不到來自美國的匯款，不得不向解放軍求援時，進駐海澱一帶的第十三軍馬上借給了燕大 500 萬元長城銀行票。¹⁸隨後，陸志韋又成功地得到 50 萬元人民幣的借貸，並多次得到了其他形式的經濟上的幫助。¹⁹不僅如此，雖然當時還處在戰爭狀態，嚴格軍事管制，當學校因需款甚急，無法去北平發送電報，陸志韋派人詢問可否安裝電臺用於發報給香港時，解放軍當局也很痛快地批准了。²⁰中共北平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這時也主動派人來清華、燕京兩校做政策說明工作，

¹⁵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頁 14。

¹⁶ 〈新中國經濟的性質與經濟建設方針〉（1948 年 12 月 25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 46-48。

¹⁷ 〈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 年 1 月 19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冊 18，頁 46。

¹⁸ 長城銀行票，即中共冀察熱遼解放區長城銀行從 1948 年 3 月開始發行的冀察熱遼地方流通券。

¹⁹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頁 16。

²⁰ 〈范天祥日記〉，1948 年 12 月 21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49021/1。注：此件檔案原件誤標為「陸志韋的日記」。下文引用不再說明，並省略館藏地及檔號。

身為中共接管人員之一的張光年²¹這時的日記就記述了他們再三去燕大、清華，向教授和學生做政策解釋工作的情況。²²

注意到這些情況，就連身為美國傳教士，並且在燕大代表著紐約托事部利益的范天祥也頗受鼓舞。聽說蔣介石下野，平津國民黨守軍將領準備與中共合作，南京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宣布願意與中共和談等消息後，他也像其他燕大中國同事一樣感到欣喜。他在日記中寫道：「這意味著主要的鬥爭快要結束，城門將要打開了。」²³

當然，注意到中共到來後在學生和青年教師中引發的變化，也讓北平許多有著強烈宗教使命感的基督徒感到有些沮喪。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對中共這時的表現有怎樣的不滿，而是因為他們吃驚地發現，他們一直在努力傳教，卻始終不能形成很大的影響力，中共才來了不過一個月時間，竟馬上就使學校裡的年輕人如癡如狂地蜂擁緊隨。包括燕京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等這時也在許多場合被問到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共一來就吸引了絕大多數學生，而基督教卻無法表現出這樣一種力量？²⁴

三、夾縫中的糾結

對於燕京大學正在發生的這種變化，陸志韋這時卻是喜憂參半。越來越強烈的「我天生是一個中國人」的身分認定，不可避免地動搖著他對美國基督教會的信任，乃至對上帝的信仰。

燕京大學是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受美國基督教在華差會之托，於 1918 年合併幾所較小規模的基督教會學校創辦起來的。它的

²¹ 即創作過著名的〈黃河大合唱〉歌詞的詩人光未然。

²² 光未然，〈萬壽山下——北京解放前夕西郊工作日記〉，《北京觀察》，1999 年第 4 期，頁 49-50。

²³ 〈范天祥日記〉，1949 年 1 月 21、22、23 日。

²⁴ 如：「2 月 4 日，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召集了北京 25 個教會領導人集會，與會的幾乎所有人都對中共的魅力感到難以理解。」〈范天祥日記〉，1949 年 2 月 6 日。范天祥並未參加 2 月 4 日的集會，此為事後聽聞補記。

經費基本上來自於美國基督教各差會和美國一些較大的基金會，包括燕園土地的購買和建設，也都是靠司徒雷登在美國募款與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的設計和督造。換言之，燕大創建和發展都離不開司徒雷登的努力，他也因此有了「燕京大學之父」的美譽。

戰後燕大復校後不久，以校務長名義掌握實權的司徒雷登應邀受命出任美國駐華大使，離開了北平。曾任代校長的陸志韋開始以校行政委員會主席名義主持學校日常工作。但掌管美國基督教在華大學的紐約聯合托事部，仍不放心把燕大完全交給中國人負責，故疊床架屋地委任了美國傳教士竇維廉為代校長兼代校務長，實際控制財政和人事大權。²⁵陸志韋不滿此一安排，一度宣布「休假」。托事部調處不成，不得不將竇維廉調去協和醫學院，陸志韋這才同意回任校行政委員會主席，並得以重任代校長職。事實上托事部並未真正讓步，又派另一位美國傳教士艾德敷(Dwight W. Edwards)前來擔任校行政委員會執行秘書，實際負責監督財務和人事。後因平津形勢危急，艾德敷堅持離去，紐約方面在無人可派的情況下，仍舊在燕大美國傳教士中找了時任音樂系主任的范天祥來做托事部在燕大的代表，授以代總務處主任職以掌控燕大財政和人事之權。²⁶

西方教會對中國教徒的不信任由來已久，但到這個時候還如此操作，就不能不極大地激起了陸志韋等頗多中國教職人員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這時對即將到來的變局不僅不反感，反而心存某種期待。以至於當 1949 年 1 月中旬，得知燕大教授嚴景耀、雷潔瓊夫婦和張東蓀等應邀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去會見

²⁵ 據《燕京大學校刊》，按照民國政府收回教育權的相關辦法，吳雷川 1928 年成為燕京大學首任校長(Chancellor)，之後周詒春於 1933 年 6 月 30 日暫行代理校長。1934 年 10 月 20 日周詒春辭職，改選陸志韋繼任代校長職。參見《燕京大學史稿》，頁 1264、1270。另從燕京大學保留下來的畢業證書印章可知，自 1937 年燕京大學校長即為孔祥熙，惟由陸志韋代行校長職務，直至 1941 年留在北平的燕大被日本人強行解散為止。(1848-1951 年畢業證書存根)，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48046/1。

²⁶ 〈陸志韋的檢討書〉(1952 年 5 月 13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49023/2。

中共領導人的消息後，陸志韋還特地托他們向毛澤東詢問：將來可否由中國人自己將燕大「收回試辦」？²⁷

不可否認，作為一位長期受美國教育並信奉基督教的知識分子，無論是從宗教信仰的觀念，還是從學術研究需要的角度，陸志韋都深信燕大不能丟了「宗教自由、學術自由」的辦校原則。將燕大「收回」自辦，必須接受政府的經費支持，喪失燕大私立的性質，特別是自由的空氣，畢竟不是他想要的。因此，當學校裡美籍教師一致推舉他做校長，並得到紐約托事部的批准後，他明顯地在考慮兩條腿走路的可能性。即一方面取得新政府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則繼續得到美國教會的經費幫助。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不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²⁸

問題是，美國人的錢依舊不好拿。由於紐約托事部對處在中共佔領下的燕大不放心，遲遲不撥款，逼得陸志韋不得不一面向中共當局借貸，一面給當時還在南京的老校長司徒雷登去信求援。他告訴司徒雷登：「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學術及宗教自由沒有任何問題，宗教禮拜及團契工作繼續進行無阻」，現在的麻煩是紐約方面一直沒有錢來。再拖下去，燕大只好解散或交給政府去辦了。²⁹

就在陸志韋給司徒雷登去信後不久，司徒的秘書傅涇波就主動向南京中共軍管會外事辦負責人黃華表示：司徒有意「在返美前能赴平與周會見一次，順便看看燕大」。³⁰對司徒雷登的這一表示，正在籌組建立新國家的中共中央很

²⁷ 雷潔瓊，〈珍藏在記憶深處的往事〉，原載《我們的周總理》，轉見周恩來紀念網，<http://zhounlai.people.cn/n1/2018/0525/c409117-30014738.html>（2018年5月30日檢索）；〈九三學社一月十四日舉行反美文化侵略座談會——陸志韋發表談話：不要用美國人的態度來看問題，清除民主個人主義思想〉，《光明日報》，1951年1月16日，第3版。

²⁸ 〈陸志韋致諾蘭德的信〉（1948年12月3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54，1952年3月13日。

²⁹ 〈陸志韋致司徒雷登的信〉（1949年5月31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49022/3/5-6。

³⁰ 〈南京市委外事辦公室致中央並華東局電〉（1949年6月10日）。按：引號內的引文為電報原文，黃華引用時對文字有個別刪改。參見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頁83。

快就做出了回應，且接連數電要黃華等向傅涇波暗示可允許司徒雷登來平見周。毛澤東還專門批示：司徒如到北平，「可望與當局晤談」。³¹

從周恩來辦公室得知這一消息的陸志韋顯然欣喜異常，他馬上按周辦的意見，給司徒雷登去了一封信，進一步傳遞了中共中央歡迎他訪問北平的消息。³²周恩來讀到陸信的副本後，又專門電告黃華：「陸志韋亦曾去信暗示司徒，如請求來平，可能得到中共許可。」³³然而，事情隨後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司徒雷登還沒有收到陸志韋的信，就接到了美國國務院不許他前往北平的電示。緊接著，當黃華再見傅涇波，瞭解司徒去北平的決定時，傅突然故作驚訝地抱怨周恩來不該將司徒想要訪問北平的消息告訴陸志韋。說什麼「陸來函很突然，使司徒頗感驚異迷惑，不知用意所在」。傅還聲稱因陸的信是寄到大使館的，結果先被使館人員拆閱了，已經有記者在打探毛澤東歡迎司徒雷登去北平的消息了。³⁴

這個時候，美國仍在支持國民政府，美蘇又處於全面對峙中，中國國內中間派對美一直頗多幻想，因此中共中央對與美國的關係極為敏感。此事若被報紙渲染，並說成是中共方面主動，將使中共陷於被動。故周恩來得訊後大為震怒，甚至懷疑這是否是陸志韋的「兩面做法」，要求黃華馬上查清司徒接到的陸志韋信的具體內容如何，以便與陸志韋之前交給周恩來辦公室的副本加以對照，「證明陰謀挑撥者究為陸抑為司徒及傅」。³⁵

³¹ 〈中央關於司徒雷登欲來北平事給南京市委的電報和批語〉，1949年6月21日；〈中央致南京市委並告華東局電〉，1949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下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冊1，頁19、20。

³² 〈陸志韋致（司徒雷登）校長函〉，1949年6月16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54，1952年3月13日。

³³ 〈中央關於司徒雷登欲來北平事給南京市委的電報和批語〉（1949年6月21日），收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冊1，頁19。

³⁴ 〈南京市委致中央並華東局電〉（1949年6月28日）。按：引號內的引文為電報原文，黃華回憶有引用，但未使用原文。參見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頁83-84。

³⁵ 〈中央致南京市委並告華東局電〉（1949年6月30日），收入《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冊1，頁20。

隨後查得的結果，陸志韋並無明顯「陰謀挑撥」的嫌疑。但無論是作為「美國燕京大學校長」，還是作為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的關係人，在司徒雷登「拒絕」了毛澤東、周恩來的「邀請」，特別是美國國務院緊接著公開發表了對華政策白皮書後，陸志韋都不再具有對外統戰的重要作用了。不僅如此，他與司徒雷登的密切關係以及燕大的美國背景，都不可避免地會使他被列入到新政權懷疑和監偵的名單中去。³⁶

四、韓戰的衝擊

從 1949 年北平被中共佔領，直到 1950 年上半年，除了華北高教部硬性要求各高校一律要設置政治教育課程外，專門針對基督教學校的整改措施還沒有出臺過。注意到中央政府準備在內務部下設立「宗教事務委員會」，統管宗教事務，以趙紫宸為主席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領導人明確主張儘快統合全國基督教團體，成立「一全國強而有力之行政總機構，以謀與人民政府宗教機構取得聯繫」。據此，基督教協進會執委會 1949 年 10 月舉行了新政權建立後第一次執委會，決議組織訪問團，馬上聯繫各地教會。三個月後協進會執委會又在上海舉行第二次執委會，成立了一個旨在統合全國基督教組織的「基督教全國大會籌備委員會」，並提出了中國人獨立辦教的奮鬥目標。³⁷這些情況無疑都直接間接地影響著基督徒們的形勢判斷。

進入到 1950 年 5 月，紐約托事部也相信應該改變近兩年來對要不要繼續支持在華教會學校的猶疑態度了。他們一面去函詢問在華各個有美國背景的學

³⁶ 〈羅申與李克農談話紀要：美國間諜在華活動情況〉（1949 年 11 月 17 日），收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4），卷 2，頁 163-164。

³⁷ 〈中華基督教全國大會籌備委員會宗教改革組趙紫宸、江長川告北京各教會函〉（1950 年 2 月初），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05/2/37-38。並見邢福增，〈反帝愛國與宗教革新——論中共建國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56（2007 年 6 月），頁 91-141。

校的生存情況，³⁸一面開始下決心全力維持包括燕京大學在內的各教會學校的私立性質。它專門就燕京大學問題通過了一個決議，指出儘管中國當前的革命強烈地吸引著中國的青年，新政權的壓力使燕京大學的管理受到了極大的挑戰，但由於燕京大學領導人的真誠和努力，學校依然在正常運行。決議因此表態稱：「在一個共產黨的國家裡，基督教學校可以自由地存在，並且可以推行一個積極的基督教計畫，我們對於這個現象不能無動於衷。」「我們將建議聯合托事部繼續團結信基督教的美國人士來支持他們在燕京的基督徒同志。」³⁹

一方面是美國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托事部下決心繼續支持燕京大學辦下去，另一方面是剛剛結束的全國高教會明確肯定私立的教會學校可以繼續辦，並容許設置宗教課為選修課，經費有困難政府也會予以照顧，⁴⁰這自然讓陸志韋等人對燕京大學的前途更有信心了。還在全國高教會結束前一天，他就信心滿滿地給全校教職員寫了一封公開信，宣布：「中國的私立高等學校的情況，最近北京舉行的高教會上徹底討論過了，會議的氣氛是令人鼓舞的。私立高等學校將被積極地維持，穩步地前進，財政上由政府補貼，以直接為人民服務。」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配合國家的經濟建設，做一些院系的調整。⁴¹

很明顯，在這樣一種心理的支配下，儘管得知朝鮮於 6 月 25 日爆發了戰爭，美國政府 27 日宣布出兵朝鮮並派第七艦隊介入臺灣海峽，陸志韋等人依舊不相信這會對燕大的命運造成怎樣不利的影響。

³⁸ 紐約聯合托事部格外關心者有四，1. 學校還能否維持教學與研究的自由？2. 還能否維持基督教的傳教及信仰自由？3. 還能否由基督教團體來指導？4. 還能否維持私立地位？見〈紐約聯合托事部執行秘書麥默倫給中國基督教各大學校長的信〉（1950 年 6 月 2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49022/3/18-20。

³⁹ 〈紐約聯合托事部關於燕京大學委員會的決議〉（1950 年 5 月），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49022/3/16。

⁴⁰ 錢俊瑞，〈團結一致，為貫徹新高等教育的方針，培養國家高等建設人才而奮鬥——一九五〇年六月九日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的結論〉，《人民教育》，卷 2 期 2（1950 年 12 月），頁 12-13。〈陸志韋給聯合托事部執行秘書麥默倫的信〉（1950 年 6 月 28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49022/3/22。

⁴¹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頁 17。

28 日一早，電臺廣播了聯合國安理會在美國推動下通過出兵干涉朝鮮的消息。之前就從美國之音的廣播中得到消息的美籍教師和家屬，開始找到校長辦公室，要求學校籲請紐約托事部向美國國務院申請派船來接他們離開中國。但陸志韋卻表示了拒絕，他明確表示，還用不著那麼緊張。⁴²

陸志韋之所以會有這種判斷，是因為他剛剛收到了教育部批准燕京大學聘任美國人葛維廉（William Gilkey）、包貴思（Grace Boynton）以及法國人邵可侶（J. Reclus）回校執教申請的批覆，他不相信政府對教會學校的政策馬上就會發生改變。而且，從爭取使燕大能夠渡過難關的角度考慮，他也堅信越是這種時候就越是要繼續保持學校的國際化色彩。為此，他有意加強了同美國教師接觸的時間，以便讓他們不那麼緊張。⁴³看到有同學張貼辱罵范天祥的標語，他還很不以為然地公開批評說：「大家都是愛國的，我們也愛國，他們也愛國，我們的話少刺激一些。」⁴⁴

同樣在 6 月 28 日當天，陸志韋還給紐約托事部執行秘書麥默倫（Robert J. McMullen）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稱：讀到你們的決議，「我們不僅覺得在經濟上可以不必發愁了，並且體會到我們和你們之間一向所未有的同志感，以及對你們應負的責任。」他還特別告訴麥默倫，只要托事部能慷慨撥款，燕大就可以減少對自身也面臨經濟壓力的政府的依賴，並把我們的鬥爭和堅持繼續下去。⁴⁵

但是，隨著政府反美宣傳的調門急劇升高，陸志韋這個時候並不敢隱瞞紐約托事部的來信。接到托事部的來信後他就把信交給了自己的秘書，同時也是中共黨員的楊汝佶，主動說：「請你們支部研究一下。」⁴⁶而他多少還抱有的

42 〈范天祥日記〉，1950 年 6 月 28 日。

43 〈范天祥日記〉，1950 年 7 月 7、18、21 日。

44 〈小文學院師生討論陸校長檢討〉，《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 38，1952 年 3 月 2 日。

45 〈陸志韋給聯合托事部執行秘書麥默倫的信〉（1950 年 6 月 28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49022/3/21-22。

46 〈學生支部工作科轉報陸志韋送交的美國托事部來函〉（1950 年 7 月 12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31/1/1。

一線希望是，紐約托事部下決心在經濟上支持燕京大學的決議，或許會讓中共領導部門認為讓燕大保持與美國基督教會的關係還是有價值的。

陸志韋想要繼續爭取美國資助辦學的希望很快就破滅了。7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明確認定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國的教會是帝國主義用來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要求中國的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響應基督教革新派吳耀宗等人的號召，與外國脫離一切關係，「自治、自傳、自養」。⁴⁷

7月28日，經周恩來等審議並提出修改意見後，吳耀宗等擬就了題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三自」革新宣言，號召全國基督教徒割斷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尤其要肅清基督教內部的美帝國主義影響。⁴⁸經過近兩個月徵集簽名後，《人民日報》於9月23日全文發表了這篇有陸志韋、趙紫宸等燕京人署名的宣言。可以肯定，無論是陸志韋，還是趙紫宸，也包括大多數中國基督教人士，內心裡都希望中國的基督教能夠實現「自治、自傳、自養」，但按宣言的要求，切斷與美國的關係，「在最短期內，實現自力更生的目標」，則意味著燕京大學和宗教學院非很快改私立為公立不可。⁴⁹不難想像，在這一點上，陸志韋和趙紫宸無疑是有所保留的。

中國基督教會的革新宣言，幾乎馬上就引起了美國基督教各差會的強烈反應。29日，紐約聯合托事部副秘書長即來信要求陸志韋「限期答覆」：燕大還有無可能繼續保持與美國教會的關係，還有無可能繼續接受美國基督教會籌措的經費；燕大的西籍教師還能否受到尊重和保護；今後的通信聯繫是否將會中斷等？陸志韋接信後，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回復。拖了一個月時間，反覆思考，

⁴⁷ 〈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1950年7月23日），上海檔案館藏，檔號 B22/2/1/1-3。

⁴⁸ 周恩來提出修改意見，可見1950年6月1日周致上海市政府潘漢年副市長轉吳耀宗信，由此亦可知宣言稿早就在徵求意見中。《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卷2，第頁453。

⁴⁹ 見〈防止帝國主義利用教會危害中國人·中國基督教界發表宣言〉，《人民日報》，1950年9月23日，第1版。

並與親近同事商量後，他還是認為政府不會因為要求教會自治，連私立的燕京大學向海外籌措經費都禁止掉。⁵⁰據此，他回信做了如下解釋。

他寫道：「我只能向你們保證說，情況決不會壞到連我們通信都不可能的程度。」所謂在教育工作或甚至是傳教工作上「不得接受國外經濟援助」的報導，完全是無稽的。國外經濟援助是許可的，而且為了辦教育是非常歡迎的，就是在更壞的國際的複雜情況下也是如此。

他的根據是，周恩來在頭一年的高教會議上曾經講過，「盜泉之水，可以灌田」。教育部長馬敘倫在說明政府不得不接管有天主教背景的輔仁大學⁵¹的原因時，也曾明確表示，在新民主主義的條件下，政府決不會反對私人辦教育。⁵²

很難相信陸志韋寫下這番話的時候，內心裡真的有這樣的底氣。就像他在校委會談及高教會時頗多批評，但給全校教職員的信卻只講好的一面；他明知紐約托事部很難接受把政治教育課列為學生必修課，但他卻一再輕描淡寫，說：「我不相信政治教育的課程會成為學術自由的阻礙」，而且「我們今年在這上面的花費很少」。⁵³顯然，無論是為了穩定內部人心，還是為了不讓美國資助方退縮，他常常不得不講些連他自己也並不那麼相信的話。

⁵⁰ 據財會人員後來揭發，陸志韋這時與聶崇歧等特別討論過燕京是否繼續接受美國款項的問題。陸認為可以繼續接受，並說「國際上的事不能看得那樣死板」。〈群眾對陸志韋檢討提出許多疑問，應該深入進行討論具體分析研究〉，《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 53，1952 年 3 月 12 日。

⁵¹ 原天主教聖言會創辦並資助的輔仁大學，因不滿校長人選問題等，於 1950 年 9 月下旬決定停止提供補助費，教育部遂於 10 月 10 日宣布由政府接辦。輔仁大學校友會編，《輔仁大學校史》（北京：北京社會出版社，2005），頁 60-61。

⁵² 〈陸志韋給美國聯合托事部副秘書長威廉·凡的覆信〉（1950 年 10 月 29 日），收入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編，《美帝國主義為了維持燕京這個文化侵略據點在解放前後所進行的陰謀活動》（1952），頁 16。注：耶魯大學圖書館保存之件標注時間為 1950 年 10 月 28 日。見 Box 54 Folder 1396-1398, Luh Chih-wei, 1945-1952,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⁵³ Luh Chih-wei to Dr. McMullen, 11/01/1949; Luh Chih-wei to Dr. McMullen, 28/06/1950, Box 54 Folder 1396-1398, Luh Chih-wei, 1945-1952,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其實，朝鮮戰爭爆發前，在 5 月底 6 月初全國高教會和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和劉少奇都再三講，現在除了臺灣、西藏尚待解放外，全國的戰爭都停了，因此可以緩和一點了，「不要四面出擊」，「絕不可樹敵太多」。包括對教會學校，原則上「我們是不允許外國人在這裡辦學校的」，但現在「目前國家財力人力不夠，還不能收回」，因此要「暫時維持現狀」，並且提出：「不要針鋒相對的反宗教，不必講從猿到人」。⁵⁴顯然，這也正是陸志韋認為新政權不會干涉燕大宗教自由和學術自由的一個重要的政治背景。但他不瞭解的是，在認定了美國已經嚴重威脅到國家安全，必須出兵朝鮮參加對美作戰的情況下，一切都已經改變了。

10 月 8 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出兵的決定。兩天後，即 10 日，毛澤東抓住這「千載一時之機」，下令開展全國範圍的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隨後亦批准土改運動轉採較激烈手段。⁵⁵在這種情況下，對敵國美國人控制的教會學校、醫院等各種文化、救濟機構等，自然不可能「維持現狀」了。

1950 年 11 月 1 日，中國志願軍入朝作戰的消息開始傳達到各機關單位和學校廠礦，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宣傳運動馬上被發動起來了。⁵⁶接連兩天注意到《人民日報》等報紙越來越多地開始刊登人們「志願赴朝參戰」的宣傳報導後，范天祥於 3 日晚去找了陸志韋，要求他向有關當局問明，到底美籍教師要不要離開？陸次日下午專門跑了一趟教育部，得到的答覆仍是模稜兩可。因此他回來後當晚在家裡召集了所有的美籍教師，對他們說：政府並不要求教書的美國人都離開中國，他個人也還是希望美國教師繼續待下去。但他也不得不說

⁵⁴ 〈毛主席和劉少奇對高教政策的指示〉，1950 年 6 月 5 日傳達，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卷 1，頁 149、153-155。

⁵⁵ 劉少奇明確講：「抗美援朝很有好處，使我們的很多事情都好辦了……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參見〈劉少奇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1 年 5 月 7 日；〈陶鑄在分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關於土改和反地方主義問題〉（1952 年 7 月 6 日），收入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廣東省檔案館編輯，《廣東省土地改革運動史料匯編》（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廣東省檔案館，1999），頁 619。

⁵⁶ 《人民日報》1950 年 11 月 2 日起開始正式發布抗美援朝的消息。

明，他並不清楚中美真的打起來會發生什麼情況。他能保證的只是，無論何種情況，西籍教師的去留及人身安全，都不會有問題。⁵⁷

五、難逃「老校長」

抗美援朝的宣傳運動旨在激發中國人愛國的民族主義情緒。爲此，燕大在1950年11月15日按照上級部署組成的「保衛世界和平反美侵略委員會燕大工會分會委員會」，第一步工作就是針對師生中存在的「親美、崇美、恐美情緒」，進行「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國主義的「三視教育」。⁵⁸委員會成立第二天上午先舉行了各小組長會議，下午又召集部分教職員在臨湖軒開會，根據組織者擬定的話題，著重討論了「美國是否民主」「美國在華辦學校是否文化侵略」和「美國之音」的作用是什麼等問題。16日下午的會議記錄顯示，在新聞系主任蔣蔭恩的主持下，雷潔瓊首先講述了自己在美國留學時深感中國人受歧視的經歷；歷史系教授聶崇歧和政治學系講師吳東之接著談了英美經濟上如何不民主，大資本家如何操縱政府和議員爲自己服務的情況。政治系主任陳芳芝講了美國文官制度表面上很文明，實際上政客政治如何黑暗。蔣蔭恩、社會系教授嚴景耀和經濟系主任鄭林莊則談到了美國之音和美國的報紙雜誌如何造謠，爲美國侵略政策做思想戰工具。談到美國在華辦學校醫院等，發言者一致強調這是別有用心，目的是要培養具有親美、崇美心理的知識分子。⁵⁹

⁵⁷ 〈范天祥日記〉，1950年11月3、6、8日。

⁵⁸ 〈中央關於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1950年10月26日），收入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頁139-142；〈保衛世界和平反美侵略委員會燕大工會分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1950年11月15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29/1/12-19。

⁵⁹ 〈燕大反美侵略委員會工會分會學習怎樣認識美國第一次漫談通知〉（1950年11月16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29/1/21；〈教員座談會記錄〉（1950年11月16日），《燕京工人》，號外第二號（1950年11月19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29/2/23-24。

接連兩天的會議，雖然達成了組織者通過要求政府禁止收聽美國之音的呼籲的效果，⁶⁰但發言者多半都不願觸及燕大與美國的關係這一話題。生化系主任蔡錕生是主動提出對美國在華文化事業危害性的討論應當密切聯繫燕大實際這一問題的人。他並且尖銳地提出了對老校長司徒雷登應如何認識的問題。但即使政治上很進步的教師，在這個問題上也大都含糊其辭，話裡話外都不認為司徒雷登在燕大期間有什麼問題。如 1949 年初就受邀前往西柏坡見過毛澤東的嚴景耀只是說，司徒雷登當大使後「有些變了」。早就是北平地下黨員的國文系講師盧念蘇也強調司徒雷登在當大使後跟在馬歇爾後面跑，擁護蔣介石當總統，搞戡亂，包括經手訂立中美商約，在人格上與之前有很大不同了。只有數學系年輕講師李歐敢於質疑美國人辦燕京大學的目的，說：「〔對〕司徒不應分兩段，好壞不是分裂的。作大使以前，在燕京辦教育就有侵略。我自己就總覺得仇恨美國的心理始終不強。這就是燕京給我的影響。」⁶¹

把有著「燕大之父」美譽的司徒雷登和美國侵略行徑聯繫起來，無疑是校反美侵略委員會這時所要達成的最主要的一個目的。11 月 21 日，委員會下發給教師們的討論提綱直截了當地提出了燕大這一最為要害的問題：

- 一、司徒雷登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1) 司徒對燕京有什麼貢獻？2) 是否做大使後司徒變了？3) 為什麼現在要批判司徒雷登？
- 二、美國人到底為什麼拿錢辦燕京？1) 誰控制了燕京的經費？2) 燕京是否為中國造就了許多人才？⁶²

在第三次教職員座談會上，聶崇歧根據宣傳組的安排，按照預先準備好的發言提綱，做了主導性的發言。他雖力求對司徒雷登做出基本否定的評價，但除了談到司徒雷登做大使的那段經歷以外，對司徒雷登其他時期活動的政治背景及

⁶⁰ 〈燕大教員座談致函政務院，要求取締收聽美國之音〉；〈燕大新聞系舉行座談會：要不要收聽美國之音？〉，《光明日報》，1950 年 11 月 20 日，第 3 版。

⁶¹ 〈教員討論會記錄〉（1950 年 11 月 17 日），《燕京工人》，號外第二號（1950 年 11 月 19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29/2/24-27。

⁶² 〈燕大反美侵略工會分會宣傳組邀請函〉（1950 年 11 月 20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29/1/10。

目的的判斷，仍舊顯得不那麼有底氣。他的說法是：司徒在中國五十餘年，直至創辦燕京，首任校長，都與政治無大關係。「以後因發展燕大關係，逐漸與政界接觸」，但主要工作還是發展學校。他認為司徒雷登的突變是在「九一八」以後，逐漸與美國政府有聯繫，與蔣也有聯繫了。「恐怕有許多事受命美國，也可能幫美國搜集情報」。「做大使以後劣跡昭彰，大家都明瞭」了。

這樣的揭發因多屬猜測，還是激不起與會教師們的批判熱情。最後會議主席蔣蔭恩不得不出面來表態說：「我們討論批判司徒決不是打落水狗，忘恩負義，小題大做。我們在這裡談論這個問題，感情上毫無說不過去的地方，我們要站穩立場，因為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根據中國人民抗美援朝運動的要求出發。我們不是批判個人，而是從政治上來批判。」⁶³

在這個問題上最感到苦惱的無疑是繼任校長的陸志韋了。司徒雷登早在1921年就做了他的主婚牧師，1927年在他最感困難的時刻把他禮聘到燕京，1934年更放手讓他接掌了代理校長的職務，使他和燕大結下了20多年的情緣，親眼見證了燕大成長的艱難，也成就了他一生最主要的事業。⁶⁴他之所以苦心孤詣、委曲求全，必欲維持燕大的地位，這種情感的因素顯然在起作用。但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中國竟會和美國刀兵相見，更想不到事情會發展到自己必須要和恩師撕破臉的地步。

鑒於再無希望可言，他不得不告訴范天祥等美國教師：他們現在恐怕是非離開不可了。⁶⁵但做出這一痛苦的決定之後，他仍舊在努力做各種嘗試和試探，包括去教育部向有關領導人為保留部分西籍教師申訴理由。因為一旦邁出放走美籍教師這一步，燕大不僅難保私立性質，它的傳統和特點也將喪失殆盡。因此，12月9日，他一面在《人民日報》上領頭署名發表〈打碎美帝的

⁶³ 〈第三次教職員座談會記錄〉（1950年11月23日），《燕京工人》，號外第三號（1950年11月27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29/2/29-30。

⁶⁴ 項文惠，《廣博之師：陸志韋傳》（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頁40-41、64、69-70。

⁶⁵ 〈范天祥日記〉，1950年11月21、22日。

文化侵略)的聲明,一面卻又再度向范天祥等表示,如果他們願意留下來,他還會全力支持和設法。⁶⁶

但是,這個時候所有高校都在公開高調反美,就連同樣接受美國基督教會資助的南京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等,也都公開表態要徹底切斷與美國的關係。金陵大學甚至還首先把鬥爭矛頭指向了在校美籍教師費睿思(Helen Ferris)、芮陶庵(Andrew Roy)、林查理(Charles Riggs)等,⁶⁷這種情緒不可避免地也感染到燕大的部分學生。范天祥 15 日甚至得到警告,他在校內可能會受到情緒激烈的學生的襲擊。⁶⁸

不僅如此,12月19日,陸志韋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中共中央正式發布了對教會學校外籍教職員處理辦法的指示,提出:除了有目的地留下少數政治上積極反美或確有學問技術專長者外,「一、願意回國者,讓他們回國。二、查出有犯罪行為者,由政府法辦,驅逐出境,並公布其罪狀及證據。三、查出有反動言行,經群眾與之鬥爭,不肯承認錯誤者,使學校撤銷其職務。」⁶⁹

美籍教師留不下來,學校的經費只能依靠政府。僅此,燕大被政府接管就不可避免了。

六、燕大的「新生」

1950年11月28日,美國政府代表奧斯丁(Warren R. Austin)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公開為美國100年來在中國舉辦的文教、衛生、救濟和宗教事業進行辯護,強調美國的捐助不僅是中國大部分孤兒院所需經費的主要來源,而且還幫助了中國八分之一大學生和25萬以上中小學生完成他們的學業。⁷⁰美國政

⁶⁶ 〈范天祥日記〉,1950年12月11日。

⁶⁷ 〈南京金陵大學師生揭露美國教授反動言行〉,《人民日報》,1950年12月8日,第3版。

⁶⁸ 〈范天祥日記〉,1950年12月15日。

⁶⁹ 〈中央對教會學校外籍教職員處理辦法的指示〉(1950年12月19日),收入中共中央統戰部編,《統戰政策文件彙編》(北京,1958),冊3,頁1922。

⁷⁰ 《人民日報》,1950年12月30日,第4版。

府的這種表白，是和它宣布凍結中國在美國國內的財產，禁止美國註冊的船隻駛往中國的命令幾乎一起到來的。結果是，中國政府除了同樣宣布凍結美國在華財產外，同時也順帶全面接收了美國在華各種文教、衛生、救濟事業。⁷¹用周恩來的話來說：我們早就準備把美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餘勢力清除出去，美國宣布凍結我國在其境內的財產，這正好「給了我們一個很有利的機會」，我們可以「提早」實現這一目標了。⁷²

在抗美援朝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全體國民的愛國主義激情燃燒的政治大氛圍下，燕大上下對於政府的決定自然都是贊同之聲。但多數教職工更關心的是，切斷了與美國的聯繫，燕京大學今後怎麼辦？這時兼任校教育工會主席的鄭林莊的表態就曲折地反映了多數師生的想法。他的說法是：「我們燕京大學是一個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因之也深知美帝文化侵略的毒辣。」因此，只有在政府進一步的幫助下，使燕大真正成爲人民的事業，教師們的工作才會更有積極意義。⁷³

這個時候的燕大人，大都還沒有能夠從他們久已習慣的舊燕大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走出來。除了報紙刊物上的激烈文字和廣告欄上各種會議的大字提示外，校園內似乎一切如常，歲月靜好，就連學生的團契活動也沒有停止。宗教學院的團契像往年一樣，正忙於聖誕節目和傳播福音的各種準備。⁷⁴馬上就要離開中國的范天祥也依舊在幫助唱詩班排練聖誕演出。作爲他在中國渡過的最後一個聖誕節，連他自己都有些意外，因爲除了清華學生參加得較少外，所有一切都與過去沒有什麼不同。他在日記中記述稱：「晚上，明月當空，唱詩班……表演得很好。現場很多人，充滿了崇敬的氣氛。」晚飯後，「我們全

⁷¹ 郭沫若，〈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報告〉（1950年12月29日），收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冊1，頁511-515。

⁷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上卷，頁109-110。

⁷³ 〈燕大師生紛紛發表意見，對政務院決定表示興奮〉，《光明日報》，1951年1月1日，第3版；浦熙修，〈燕大師生一致擁護政務院的決定——訪陸志韋先生〉，《人民日報》，1951年1月15日，第3版。

⁷⁴ 〈范天祥日記〉，1950年11月14、15日。

部坐驢車且唱著聖歌去甯德樓，大約 100 人。我們……共走過 53 家」。由於趙紫宸家人太多，他們沒進去，但先後去了陸志韋家院子裡和吳路義（Louis E. Wolferz）家裡，與在那裡的師生聚了一會兒。然後范天祥領著唱詩班來到他的家，一起享受糖果和茶水，「現場甚是熱鬧」。聖誕日上午，像往年一樣，范天祥領著唱詩班在臨湖軒為幾百名學生演唱了《彌賽亞》，晚上又去清華為幾十名學生演唱了聖歌。⁷⁵

新年過後，即 1 月 3 日上班的第一天，校務委員會開會討論教育部節前提出的燕大問題的解決方案，一是燕大改為國立大學，像清華一樣，由政府負起財政責任；二是提供資助，燕大繼續保持私立大學的現狀。陸志韋顯然傾向於保持私立地位，⁷⁶但「大多數與會者毫不遲疑地贊成變為國立大學的提議」，因為他們希望自己和學生都能享有與其他國立大學一樣平等的地位，不願因私立不受國家重視，更不願因堅持私立而導致在政治上不被信任。⁷⁷

經過兩天的討論，陸志韋答覆了教育部，請求政府接管燕大為公立大學。教育部隨後回函表示同意：1 月分即開始撥款，燕大的資產仍歸燕大有效使用，燕大的「管理體制和學術標準將予以保留」，惟宗教學院仍維持私立地位。⁷⁸

1951 年 1 月 15 日，在燕大工作了 27 年之久的范天祥，去公安局申請辦理離境返國的手續。其他在燕大沒走的美籍教員，基本上也都先後離開了。這種情況，對於不少長期深受燕大大家庭氛圍薰陶影響的一眾師生來說，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一些情感上的觸動。得知范天祥夫婦準備回國的消息，一些教師紛

⁷⁵ 〈范天祥日記〉，1950 年 12 月 24、25 日。

⁷⁶ 范天祥稱陸志韋希望保持私立的原因主要是：「1. 宗教學院能被照顧；2. 我們有一點更多的自由；3. 當美國和中國交好時，由於保持私立，可以使我們更容易繼續。」〈范天祥日記〉，1951 年 1 月 3 日。

⁷⁷ Dr. Ralph Lapwood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 01/04/1951, Box 51, Folder 1319-1320, Lapwood Ralph, 1947-1954,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⁷⁸ Developments at Yenching University, 01/31/1951,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紛前去問候。西語系系主任柯安喜 (Anne Cochran) 夫婦不等開學即匆匆離別，讓寒假中在校的西語系師生尤生感傷。在最後話別時，不少人都掉了眼淚。西語系幹事會還專門做了兩面繡著中文的錦旗，送給這兩位在燕大英語教學上服務了 23 年的美國人，一面題為「春風化雨」，一面題為「惠我孔多」。⁷⁹

從 1 月中旬開始，燕大在北京市和教育部的雙重安排下，接連請宣講人員來校進行反美講演。這些講演著力於揭露美國政治的民主假相和黑暗內幕，其政治宣傳和感染的力度遠大於燕大教師自己的認識水準。再加上其他教會學校揭批美國教師的經驗和角度，也都對燕大人聯繫本校實際的揭發批判，產生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因此，從 16 日開始的燕大教工小組和學生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漫談會上，發言的火力明顯增強了許多。

蔣蔭恩和蔡錮生等帶頭揭批美國人對燕京大學師生的毒害。他們揭露說，在燕大，外國人的地位總是比中國人高，曾經做過代校長的美國人竇維廉甚至公開為外國人待遇高辯護，說「外國人教書效率高」。說他手下的蔡一鏢更是典型的洋奴嘴臉，竟說什麼中國教員就是要「用鞭子抽著走」。會計主任郭美瑞 (M. Cookingham) 帝國主義作風十足，動輒就說中國人髒，防手下人像防賊一樣。說在燕京，英語是第一位的，只要英文好，就能獲得種種好處，會英語和不會英語的人收入要差很多，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強化了崇美思想。就連燕京人教小孩子，也往往要小孩子用英文稱呼叔叔阿姨。大家什麼都學洋人，穿西服說洋話，至少也要穿半西服說半洋話（夾用英文單詞）。⁸⁰蔣蔭恩這時還在《光明日報》上以「一個燕京人的自白」為題公開發表文章，認定過去的燕京大學「不止於宣揚美國物質文明，販賣美國生活方式，還有更甚於此的，

⁷⁹ 〈西語系因送謝給柯安喜引起爭辯〉，《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快報》，期 1，1951 年 2 月 20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29/2/5。

⁸⁰ 《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快報》，期 2，1951 年 2 月 19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29/2/5-6；〈第廿四小組會議紀錄〉（1951 年 2 月 20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29/1/1-6。

那就是造成青年學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國家，覺得自己的國家什麼都不行，因此也就漸漸地失去熱愛自己祖國的心情。」⁸¹

這一波揭批熱潮，馬上就牽出了西語系幹事會向柯安喜夫婦贈送錦旗一事。一些學生強烈質疑此一作法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校學生會馬上通知了市公安局，要求警方幫助將兩面錦旗在柯安喜夫婦出境前截留下來。由於柯安喜的丈夫已早一步離境，最後只攔截下來「春風化雨」一面錦旗。

但學生會的這一作法，也在學生當中引起了爭論。堅持反對送旗的學生認為：「這些美國人都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執行美帝對華的文化侵略，是侵略工具，我們不應對他們存有任何好感。」尤其是在抗美援朝運動高潮的時候，用「春風化雨」的旗子表彰美國教師的作用，很可能會被人利用來說中國學生並不反對美國在中國辦學校。他們說：「美帝侵略我們一百多年，沒有他們的侵略，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早就發展起來了，帝國主義辦的大學對我們沒有好處。」

持不同意見的同學則堅持認為，柯安喜沒有進行任何文化侵略，沒有說過反對中國政府的話，她教的語言學很科學化，課程中也沒有灌輸過麻痹我們的思想。因此，她不是文化侵略的工具，不是敵人。即使她被美國政府所利用，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幫助了文化侵略，她本人也是無罪的。她在燕京十多年，教學生非常認真，僅就師生感情來說，也應感謝她。從團結國際友人的角度，要爭取他們，送他們一面旗子，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⁸²

這種情況再度反映出，新政權要想在燕京大學這種長期被美國文化薰染的地方，迅速讓所有人都樹立起反美、仇美的思想，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多半也是為什麼政府決心接管燕京大學，卻並不急於馬上改變燕大既有權力格局的一個原因。

⁸¹ 蔣蔭恩，〈一個燕京人的自白〉，《光明日報》，1951年2月1日，第3版。

⁸² 〈西語系因送旗給柯安喜引起爭辯〉，《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快報》，期1，1951年2月20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29/2/5。

1951年2月12日是燕京大學再生之日。還在頭一兩天，「貝公樓」（Bashford Hall）的牌子就被換成了「辦公樓」，「寧德閣」（Ninde Hall）改成了「民主樓」、「麥風閣」（Miner Hall）和「甘德閣」（Gamble Hall）改成了「姊妹閣」，「適樓」（Sage Hall）改成了「俄文樓」，「穆樓」（McBrier Recitation Hall）改成了「外文樓」……燕園裡凡帶有舊中國色彩和美國文化痕跡的名稱大都不復存在了。12日這天，辦公樓前新搭起一座牌樓，上面掛著巨大的橫幅，紅底白字醒目地寫著「慶祝燕大新生」。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和副部長錢俊瑞、曾昭掄等親臨燕大，代表政府宣布正式接管燕京大學。⁸³政務院隨後通過決議，批准了教育部的接管行動，並任命陸志韋為校長。政務院的委任狀上還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的簽章，毛澤東本人還親筆為燕京大學題寫了校名。⁸⁴給人印象，燕大已經渡過劫波，再不必為自身命運提心吊膽了。

一切跡象都顯示，曾經在美國人控制下的燕京大學，正在發生革命性的變革，但它看上去似乎還不會與舊傳統一刀兩斷。因此，陸志韋還想做下去。但在范天祥看來，陸志韋12日的表現無論如何都是難理解的：「在他發表就職演辭期間，在眾來賓面前」，語帶輕蔑地舉起幾天前收到的來自紐約托事部的電報，斥責美帝國主義至今「還以欺騙和利誘的手段，妄想達到繼續對中國人民進行文化侵略的目的」。並聲稱從今以後，「不論在名義上、實際上、經費來源上、教學的觀點與方法上，燕京都完全而且永久是中國人民的大學了」。它不僅會回復已往的高峰，而且將會發展到超過美國人過去所能想像的程度。⁸⁵

⁸³ 白崇義，〈解放初期的燕園生活〉，《燕大文史資料》，輯3，頁440-441。

⁸⁴ 〈教育部接收燕京大學·全體師生熱烈慶祝〉，《人民日報》，1951年2月14日，第2版；〈燕京大學大事記〉，收入《燕京大學史稿》，頁1374。

⁸⁵ 〈陸校長的話〉，《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快報》，期1，1951年2月20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YJ50029/2/4；並轉見《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頁18；范燕生著，李駿康譯，《穎調致中華：范天祥傳——一個美國傳教士與中國的生命交流》，頁277。

七、風暴到來了

1951 年上半年，新政府全力推行土改、鎮反和抗美援朝三大運動，一時還無暇顧及教會大學的進一步改造問題。因此，燕京大學除了按照教育部的部署，繼續揭批控訴美國教師「反動言行」，並將他們逐出大陸外，全校渡過了兩年來最爲平靜的一個學期。英語教師巫寧坤的回憶很傳神地從一個側面描述了這段時間裡燕大教師們神仙一般的工作生活情景。

一方面，他們按照新政府的要求，在授課中政治掛帥。巫負責教「英國文學史」和「高級作文」。「對馬列一竅不通」，就從帶回國的幾百本書中，每天讀些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英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著作及美國「進步作家」的小說，「驢頭不對馬嘴」地剝出一些階級鬥爭之類的概念，打成講稿，講給學生聽。另一方面，教師們在私下裡仍舊保持著親密關係，你來我往，時常一起喝咖啡，品白酒，談天說地，撫琴吟詩。只要在京，陸志韋有時也會跑到年輕教師家去串門兒，「聊聊天兒，打打橋牌」。⁸⁶如英語系新任主任趙蘿蕤是趙紫宸的女兒，她丈夫陳夢家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在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橋牌打得好。國學造詣極深，又喜歡打橋牌的陸志韋，就常到陳夢家家裡去打牌。兩位只要坐在一起，常常「出口成章，妙趣橫生」，讓牌友們很是享受。⁸⁷

然而，這不過是山雨欲來前的短暫平靜罷了。1951 年第二個學期剛開始，針對學校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就出人意料地突然降臨了。伴隨著驚心動魄的聲討批判的狂潮，向來受人尊敬的教師們斯文掃地，燕京大學的厄運也隨之到來。

⁸⁶ 陸志韋報名參加全國政協西南土改工作團，曾於 1951 年 5 月 16 日出發，離校近三個月。見陸志韋，〈知識份子下鄉〉，《光明日報》，1951 年 10 月 22 日，第 2 版，並見《大公報》（香港），1951 年 10 月 13 日，第 6 版；10 月 14、15 日，第 7 版。

⁸⁷ 巫寧坤，〈序〉，《孤琴》（臺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08），頁 4。

這場運動原本只是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等多位教授，為響應中共號召，發起的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馬寫信邀請中共領導人到校做報告，周恩來同意受邀，並建議教育部把報告範圍擴大到京津地區各主要高校的教師，教育部也藉此把運動從政治學習擴大到了思想改造。

9月28日，周恩來以自身經驗為例，做了一個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必要性的報告。幾天後，陸志韋在燕京大學學習動員會上傳達了周報告的內容，並宣布成立了以自己為主席的燕京大學教員學習委員會。⁸⁸但所有人這時都還沒有把這場新運動看成是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委員會只是要求各教員小組每週三晚上要定時進行聯繫個人思想的政治學習而已。⁸⁹

兩個月後，另一場原本也只是著眼於增產節約的運動，意外地發展成一場大張旗鼓的旨在打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兩場運動相結合在北京各高校所導致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北京市委在教育部和團中央的配合下，直接委派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蔣南翔任組長，北京市團市委副書記張大中任副組長，率工作組分別進駐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以開展三反鬥爭為名，著手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洗的試點工作。

按照既定的部署，由張大中所率的工作組進駐燕京大學，馬上就成立了校節約檢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校節檢委」），接管了學校的領導權。緊接著，工作組雙管齊下，一面對學校裡所有掌管錢財的部門和人，查「貪污」、打「老虎」；一面把矛頭指向全體教師，特別是各級主任、校長，要求人人下水「洗澡」，檢討資產階級思想並交代政治歷史問題。張大中下車伊始就明確告誡全校教職員工：燕京大學這次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要全面揭發美國人在燕京大學做了什麼壞事，自己在其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⁹⁰

⁸⁸ 〈本校教員政治學習委員會名單〉（1951年10月8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1022/1/24。

⁸⁹ 項文惠著，《廣博之師——陸志韋傳》（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頁219。

⁹⁰ 參見張大中口述，〈談燕大思想改造運動〉，《新京報》，2005年6月9日，轉見《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頁182。

根據校節檢委的規定，全校教職員工被分爲 23 個小組，每日下午學習討論。爲加強對教師的督促和壓力，工作組特別選派了黨團學生或學生積極分子到各小組去參加會議，點火放炮，促使教師們揭發交代，開展自我批評。⁹¹同時，校節檢委組織黨團學生每日出版「三反」快報，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宣傳通訊，用來向全校師生傳遞運動消息，說明和引導運動揭批鬥爭的大方向。

1952 年 1 月 24 日，校節檢委召開了全校動員大會。隨後，各院系運動正式展開。經過幾天學習討論後，學生中批判鬥爭的熱情很快就被點燃了，一些教授已經開始主動檢討「認賊作父」，和變相幫助美國教師（「實爲美帝國主義分子」）搜集和傳遞情報的「錯誤」了。⁹²

爲了有效分化燕京大學教師，實現爭取進步，團結中間，打擊反動的目的，工作組從入校開始，就首先在教授中建立起一支基本的依靠力量。其中多數都是 1948 年中共初來北平時被認爲表現較好者。如 1949 年底被推舉爲北京市教育局局長，隨後又被任命爲燕大代理教務長的翁獨健就是最主要的依靠對象之一，因爲他早就在秘密幫助學生地下黨組織了。其他如社會學系嚴景耀、雷潔瓊夫婦，新聞系主任蔣蔭恩，化學系主任蔡鐳生，以及歷史系教授侯仁之、中文系教授林庚等，也都成爲了工作組用於領導各院系鬥爭的教師骨幹。⁹³

要在教師中展開揭發批判，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學生通常對教師有敬畏甚至是愛戴之心。教師之間除了傳統文人「不爲己甚」的道德約束外，燕大基督教大家庭的傳統與觀念，也使運動開始時學生及青年教師對教授放不開鬥爭的手腳。面對這種情況，1952 年 2 月 1 日，由代理教務長翁獨健出面，專門召集全校講師、助教開會，要求他們打破「恩師觀點」，宣稱「包括對陸校長提意見，即使批評尖銳，也不是打擊」。下午，再開全校職工大會，蔣蔭恩

⁹¹ 《燕京大學史稿》，頁 1377。

⁹² 參見燕大節約檢查委員會、新燕京社聯合出版，《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 22，1952 年 2 月 20 日。

⁹³ 參見張世龍，《燕園絮語》（北京：華齡出版社，2005），頁 9-10。

出面動員，要求大家要敢於深挖燕大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老根。晚上，團委書記阮銘則召集留校同學大會，進一步公開號召學生們勇敢揭發校內一切資產階級腐朽墮落的事實，大膽和自己的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限，不僅要敢於檢舉有違法行爲的父母，而且要敢於揭發有資產階級思想的老師。⁹⁴ 3日，學校黨團召集學生開會，更直接點名要對心理學系主任沈迺璋和歷史系教授聶崇歧、閻簡弼等展開揭批，並具體部署了揭批的辦法。⁹⁵

隨著教師自我思想檢查的全面展開，工作組和校節檢委就在此前反美反帝的愛國主義運動的基礎上，進一步把運動引上了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剝削思想的階級鬥爭的軌道。對於需要借助來領導各系運動發展的依靠對象，事先由工作組成員與之談話，具體幫助設計和修訂發言稿。同時暗中與夏自強等學生會幹部商量好，「讓他們在大會期間組織學生向大會主持人傳遞『表揚』、『滿意』的紙條，由主持會者宣讀，在一片掌聲中結束大會」。如蔡錙生教授檢討自己不該效法英法作些不合實用的研究；不該將論文寄往美國發表；不該鼓勵同學去美國留學，說這都是敵我不分，爲虎作倀，如今「感到自己的政治水準實在太低了」。蔣蔭恩教授批評自己一直存在著「濃厚的向上爬的功利思想和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翁獨健說自己因家境貧寒，既有自卑感，也有反抗性，總想做一個不平凡的人，因此總不能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侯仁之教授承認過去對司徒雷登總也恨不起來，最近才發現「自己根本問題是階級立場站錯了」。把司徒雷登的小恩小惠，「看作自己的光明前途了」。這些並不很深刻的檢討都得到了較高的評價，被認爲「肯於大膽暴露思想，接受群眾意見，誠懇檢討，受到大家的歡迎」，只一次就輕鬆過關了。受到布置的學生甚

⁹⁴ 〈講師助教召開動員大會，拋棄恩師觀點，積極展開批評〉；〈全體職工昨舉行大會，窮追猛打繼續反貪污〉；〈學生進行大會動員，深入進行三反〉，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4，1952年2月1日；期7，1952年2月6日。

⁹⁵ 鄧之誠著，鄧瑞整理（下略），《鄧之誠日記（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頁3-4。

至會帶頭鼓掌，並一擁而上，與檢討人熱情握手，此舉總能讓檢討人感激涕零，進而下決心積極參加揭批鬥爭。⁹⁶

被列為團結對象但屬於中間派的教授們，就不那麼容易過關了。閻簡弼被人揭發「解放後在燕京經常散佈反動言論，毒害青年」，如對抗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硬說愛是沒有階級性的，還宣揚黨犯過的一些錯誤等。社會學系教授趙承信和數學系教授戴文賽均被人揭發敵我不分，向美國輸送情報。趙承信就承認自己因想做國際學者，到處找材料寫論文，與美國各基金會聯繫，給他們寄雜誌並交換材料，「實質上是出賣材料，供給美帝國主義情報」。國文系副教授俞敏因為參加過國民黨，又常與閻簡弼等一起背後罵人，更是被預先布置好問題的學生反覆質問。義憤填膺的師生開起會來常常持續幾個小時，連珠炮似的質問和批判使得這些教授心驚膽戰，有人竟至當場痛哭以至下跪乞求寬恕。然而，他們多半都要經歷兩次以上這樣的場面才能勉強過關。反覆受此刺激，其內心中難免會充滿自卑感，甚至是罪惡感。一些人因此變得謹小慎微，一些人為改變形象或為避免被人指為消極，在隨後的運動中又變得極為亢奮，幾乎不可避免。⁹⁷

被列為鬥爭對象的少數教授的情況就更狼狽了。因為工作組早已內定名單，且安排好一切，總之就是「『組織火力』大加鞭笞，並且總『不滿意』，多方刁難不予『通過』」。⁹⁸如 1946 年曾經與十幾位教授聯名公開呼籲美國援助並斥責蘇聯的歷史系教授齊思和與聶崇歧，就遭遇了他們人生最初的滑鐵盧。尤其是聶崇歧，不僅歷史上簽過親美反蘇的公開信，而且因受陸志韋器重，1949 年一度得以出任教務長，常常因自信讓人覺得盛氣凌人。他被人揭發拉幫結派，組織「飯團」，每月進城聚餐一次，平時每一兩星期也會在一起，罵

⁹⁶ 〈化學系全體師生職工召開大會，蔡鑑生教授檢討了自己的崇美思想〉；〈新聞、教育兩系於六日晚七時召開全體師生大會，由新聞系主任蔣蔭恩作自我檢討〉等，《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 8、9、10、13、23，1952 年 2 月 6、10、12、20 日。

⁹⁷ 分別見〈各系教師展開自我批評〉、〈外文系師生一致控訴美帝文化侵略罪行〉、〈法學院師生大會〉，《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 9、12、17，1952 年 2 月 8、12、16 日。

⁹⁸ 張世龍，《燕園絮語》，頁 9。

這罵那。聶被迫深挖思想根源，承認自己宗派主義嚴重，待人尖刻，野心大，做事愛獨斷獨行，但被組織好的聽眾並不接受，有人當場根據預先準備好的材料揭發稱：「解放前聶先生出入剿總，給杜聿明辦報，爲什麼這些不談？」2月15日，聶崇歧和同樣深受陸志韋器重的沈迺璋更意外失去了人身自由，事因「閻簡弼暴露沈、聶辱罵領袖，群情奮激。由學校常務委員會開會，將沈、聶二人先行隔離看管」起來了。⁹⁹

這種師生內部尤其是教師之間的揭發檢舉，前所未有地暴露了學校內部存在的「派系」問題。這種因教育背景、文化傾向、師承、教學和工作關係而產生的親疏遠近，原本在教師交往乃至感情溝通上並不構成明顯的障礙，但當揭發或檢舉者出於政治目的，生吞活剝甚或摘章斷句，不顧時間、地點及相關背景，而將涉及他人的某些言論甚至是玩笑話，或加油添醋地公布出來，或上網上線加以定性，其在燕大人相互關係上造成的傷害之大，實無以復加。僅以歷史系一向埋頭學問，我行我素，並不介入學校各種事務的老教授鄧之誠運動初期的一段日記爲例，就不難看出這種情況。

據鄧 1952 年元旦日記，因其在系裡年紀最長，故頗受大家尊重，當天前來拜年者絡繹不絕，聶崇歧、閻簡弼等均在其列。運動開始之初，鄧還在與張東蓀等談論陸志韋等人的擔心，即如何經過這場運動還能保持「團結」的問題。2月5日，得知聶崇歧準備檢討材料，打算交代 1946 年陸志韋照顧其收入事，鄧還特別把聶找到家裡來，要他不要談這種事情。

接下來幾天對聶崇歧的揭批，鄧一直在爲聶不能過關而擔心。不意 9 日下午閻簡弼、俞敏在檢討中開始大揭內幕，除指稱「陸〔志韋〕爲家長或土皇帝，沈〔迺璋〕則惡霸，聶〔崇歧〕封建把頭」、自己充當「狗腿子」外，還揭孫錚「作詩誹謗」，批「陸越權包庇」，「並攻高、宋、孫亦有派系」。讓鄧大爲吃驚，「不意何以搞到如此」？但卻也不能不相信閻、俞的說法，認定「數

⁹⁹ 聶崇歧等被「隔離」兩個多月，才重獲自由。齊思和、陳芳芝等因運動初期不在校內，後被從土改工作團叫回學校接受審查與批判，編入「進修班」集中「進修」，至 7 月中旬才告「畢業」。鄧之誠，《鄧之誠日記（6）》，頁 18、19、54、93。

年來陸提拔沈、聶諸人，一腳踢倒老教員，以便獨斷獨行」，只是「不料也有今日。」

2月15日，因閻簡弼「暴露沈、聶辱罵領袖」，並稱沈還罵過鄧為「老妖」，不僅造成沈、聶被「隔離看管」的嚴重後果，而且也使鄧大受刺激，不禁在日記中怒斥沈、聶二人「狂悖」。再加上已相信沈、聶等均係「陸志韋心腹」，故而不僅暗責「陸之糊塗可知」，且開始引用詩經「邁〔覲〕閱既多，受侮不少」的句子，來評價自己與陸相處六年的關係，認為自己因「孤弱」受了不少委曲。¹⁰⁰

一位體弱多病、與世無爭的老教授，尚且會受此等揭發批判之鼓動而輕信並遷怒於被揭批者，那些血氣方剛者受此鼓動又會如何呢？

八、最後的幻滅

如前所述，在燕京大學開展揭批鬥爭，根本上是要根除美帝國主義留下的禍根。而燕大人中，真正能「裡通外國」，和美帝國主義的陰謀或威脅掛上鉤的人物，在中共中央高層看來只有三位，即校長陸志韋、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和哲學系主任張東蓀。¹⁰¹因此，自運動開始以來，工作組內定的重點批判對象，就是他們。

最先被拉出來示眾的，是張東蓀。2月8日，張以哲學系主任的身分開始做檢討，因長期與中共領導人有來往，為和平解放北平出過力，此時更身居民盟中央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之高位，因此他多少有點掉以輕心。他的檢討只講了三點：「一是哲學系沒有辦好；二是自己對校務太不關心；三是個人作風上有很多缺點。」稱自己屬於「文人型小資產階級」，自己的錯誤是「主觀方面的資產階級性質」，「不能大刀闊斧地作事」，「犯了很大的官僚主義錯

¹⁰⁰ 鄧之誠，《鄧之誠日記（6）》，頁3-20。

¹⁰¹ 張大中口述，〈談燕大思想改造運動〉，《新京報》，2005年6月9日，轉見《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頁182。

誤」。但他同時又強調自己自辛亥以來始終都站在革命這一邊，不僅在北平和平解放問題上起了作用，而且「同司徒無關係，同外國人不往來，沒穿〔過〕外國衣服，房子不挑好的」住。¹⁰²結果可想而知，新調入燕大的共產黨員教授翦伯贊當場揭露張東蓀的哲學著作都是反馬列主義的；翁獨健、閻簡弼等更揭發他不僅與司徒雷登在政治上有關係，而且在淪陷時期還與漢奸有扯不清的關係。¹⁰³

20日，張東蓀不得不在文學院做第二次檢討。這次他著重談了自己和美帝國主義分子司徒雷登、漢奸王克敏以及與國民黨反動派蔣介石的關係。他被迫承認淪陷期間曾受司徒雷登委託，為保護燕京，與漢奸王克敏有過往來。說「這是一生中最大的污點」；說自己當年被日本人逮捕只判了半年，是漢奸市長劉玉書做的保人，自己接受了這種保護，「軟弱、敷衍、遷就了當時的環境，回想起來很沉痛」。同時，他承認戰後司徒雷登和蔣介石都找過他，勸他參加國民大會；1947年國共關係破裂後為民盟的事到上海，應張群之邀去過南京，見過司徒雷登和蔣介石，建議恢復和談。他承認他當時的這一主張和中共主張相悖，「今天〔願〕當著大眾認罪」。他同時承認自己以前的著作都是有毒素的，要求圖書館把它們封存起來。¹⁰⁴

張東蓀，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畢業，「五四」時期已是風雲人物，再加上他年事已高，又是政府委員，因此一些不知內情的教師發言時還一口一個「張先生」，一邊批評他，一邊還稱他為「人民的表率」。有人更是私下抱怨：「何必翻老賬？」也有人明確講：「張先生老了，不要批評得太尖銳。」翦伯贊再度站出來痛斥張，說他政治上有野心，始終反對革命。國文系助教趙宗乾也斥責張所以倒向人民一邊純粹是受形勢所迫。但多數人最不滿的，卻是張在檢討中沒有批判自己以前反馬列主義的錯誤，只是提出把那些著作收起來了

¹⁰² 〈張東蓀先生的檢討〉，《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18，1952年2月16日。

¹⁰³ 〈小文學院全體師生認真討論張東蓀的檢討〉，《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20，1952年2月19日；並見鄧之誠，《鄧之誠日記（6）》，頁21。

¹⁰⁴ 〈張東蓀今天在小文學院作第二次檢討〉，《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24，1952年2月20日。

事。「三反」快報也馬上登出「思想雜談」，批評那些調和論者，宣稱「對任何危害人民利益的思想或現象，都應該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不能因為『老了』、『小了』而放棄了這個原則。」¹⁰⁵

幾天後，張東蓀第三度檢討，他一開始就對自己過去的哲學著作散布唯心論和反馬列主義毒素問題進行自我批判，表示願「向人民認罪」。¹⁰⁶但據工作組成員張世龍回憶：因組織上運動之初就對張東蓀、陸志韋和趙紫宸三人定下了鬥爭方針，「事先由王志誠和我分別向學生幹部報告『批判』他們的要點，其實是組織學生〔主要是黨、團員〕向大會主持人傳遞『不滿意』、『不通過』的紙條，以及對某些問題的『質問』。最後『轟』下臺來不予『通過』」。¹⁰⁷而這次，工作組還進一步拋出了張東蓀更多的「反動」罪證。如抗戰中與漢奸市長劉玉書合署主張國社黨員可以個人名義參加偽政府的提案、1934年張在《唯物辯證法論戰》一書書首赤裸裸的反共題詞。¹⁰⁸翁獨健揭發他在敵偽時接受日本人每月八百元的津貼、雷潔瓊揭發他與司徒雷登有密切關係，等等。結果，在最後一次群眾大會結束後，民盟燕大區分部全體盟員向民盟總部要求撤銷張在盟內外的一切職務。3月9日，「民盟總部開會決定張東蓀停職反省，限期交待。」而聽從沈鈞儒等人的勸告，張東蓀也主動向學校、民盟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政務院「請假反省」，再不拋頭露面了。¹⁰⁹

但工作組這時並不清楚張東蓀問題的具體要害所在，在4月中旬提交給北京市委的燕大教師思想改造運動的情況彙報裡，講到張東蓀最嚴重的問題都是

¹⁰⁵ 〈小文學院二十三日師生討論張東蓀先生第二次檢討〉，《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 25，1952 年 2 月 23 日；〈思想雜談：爲了國家人民利益，積極開展思想鬥爭〉，《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 30，1952 年 2 月 27 日。

¹⁰⁶ 〈我的第三次檢討（張東蓀）〉，《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 30，1952 年 2 月 27 日。

¹⁰⁷ 張世龍，《燕園絮語》，頁 11。

¹⁰⁸ 題詞曰：「如有人要我在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二者中選擇其一，我就會覺得這無異於選擇槍斃與絞刑。柯亨語（見附錄）東蓀書」。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 34、35，1952 年 2 月 29 日、3 月 1 日。

¹⁰⁹ 鄧之誠，《鄧之誠日記（6）》，頁 32、33。另，查張東蓀自 1949 年 9 月 30 日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後，連續出席了 13 次委員會會議，自 1952 年 4 月 18 日第十四次會議後再未參加。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室編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記錄》（1951-1952），輯 1-2。

歷史問題。相反，因燕大「三反」及思想改造運動 3 月中旬即告一段落，緊接著的「整幹，即忠誠老實運動，人人須交代歷史」運動，¹¹⁰這時也告結束，故以翁獨健為主任的新的校務委員會已宣布成立，工作組及燕大黨委的工作彙報已內定了對反動的和有嚴重問題的教授們的組織處理意見。陸志韋、趙紫宸和張東蓀被定為「反動分子」，只是由於三人不在工作組所能處理的權力範圍內，故除了撤職決定外，他們只能靜候上級指示。其他決定處分的原燕大骨幹教職員共 13 位，如政治系主任陳芝芳、心理系主任沈迺璋，和新聞系教授張隆棟，是「停職、減薪、送學習」；歷史系教授聶崇歧是「撤職，酌予生活費，送學習」；歷史系主任齊思和是撤職、減薪，繼續教書；經濟系主任鄭林莊、教育系主任廖泰初、外文系主任趙蘿蕤，是「解除職務，繼續教書」，等。¹¹¹

4 月 20 日，彭真把北京幾所高校運動材料做成簡報報送毛澤東，其中提到北京大學動員教授同事和家屬子女一起幫助有著國民黨和三青團骨幹的歷史背景的周炳琳過關的情況，毛很感興趣，肯定「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他並明確提出：「除了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以外」，其他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因為「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做法」。¹¹²

毛澤東一聲令下，燕大內定為「反動分子」的陸志韋、趙紫宸、張東蓀三人的處理方針也隨之開始有所變化了。4 月 28 日，彭真指示負責燕大的工作組負責人張大中：「張辭職的事，可暫不理他，薪金仍照發他。」工作組則召集校節檢委及校務委員會等，開始研究安排如何讓陸志韋和趙紫宸先後檢討過關事宜。

最先被安排過關的，是從 2 月 23 日到 3 月 11 日已連做三次檢討，仍被認為「不老實」的陸志韋。實際上，對陸的第三次檢討，工作組和節檢委一開始

¹¹⁰ 鄧之誠，《鄧之誠日記（6）》，頁 38。

¹¹¹ 〈關於燕京反動分子的工作計畫〉（1952 年 4 月 18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1/6/629。

¹¹² 〈毛澤東對北京市高校三反情況簡報的批語〉（1952 年 4 月 21 日），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3，頁 422。

就內定了要進一步「批倒、批臭」的方針，因而做了一系列火力全開的鬥爭場景的安排。

首先是當天會議的規模搞得很大，內定遞條斥問者和自動遞條提問當日竟有近千人之多。同時還安排了在燕大生物系讀書的陸志韋女兒上臺揭發控訴父親的罪惡，並且由校節檢委在大會上宣布解聘仍留在燕大的最後兩名美籍教師丁蔭（Samual M. Dean）和葛維廉，聲稱他們是「美國特務」和「帝國主義分子」，將送交公安機關處理。其次是接連舉辦教授批判會，和更大規模的有教育部領導人以及北大、清華各校校長和兩校師生參加的揭批大會。最後甚至還推動陸志韋妻子兒女連同保姆以「家屬」名義發表了一封表示要與「中國人民的敵人」陸志韋劃清界限的公開信。¹¹³

鑒於聶崇歧等人被隔離審查，丁蔭等被以「美國特務」和「帝國主義分子」的罪名送交公安機關，陸志韋被迫給四個兒女寫了一封交代家事的信，也做好了「入獄」的準備。他寫道：自己確實再沒有什麼「與美帝國主義分子『勾勾搭搭』的事情」可交代了，照目前的形勢很可能要「入獄」。一旦入獄，以自己的年齡和健康狀況，未必還有機會回來照顧他們和他們的母親，故必須向他們詳細交代家事並請他們準備負起贍養他們母親的責任。而更出人意料的一個後果是，因不堪這接二連三的刺激，在他家服務多年的保姆這時竟也走上了絕路，不惜以「自刎」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¹¹⁴

陸志韋所以判斷自己可能「入獄」，顯然也和第三次檢討後校節檢委辦的三反快報上加予他的「帝國主義分子」這一罪名有關。該罪名原本是用在司徒雷登等美國人身上的，一旦他也被扣上這頂帽子，其問題就成敵我性質了。雖然蔣南翔等人很快注意到這個罪名對陸志韋不合適，張大中代表工作組在教授

¹¹³ 鄧之誠，《鄧之誠日記（6）》，頁 37-38；〈陸志韋家屬全體來信〉，《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期 63，1952 年 3 月 18 日；朱伯耆，《大陸學人浩劫》（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頁 55-68。

¹¹⁴ 鄧之誠，《鄧之誠日記（6）》，頁 52。

會上明確提出了不同意見，想不到不少教授和學生還難以接受，並為此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據鄧之誠 18、19 兩日的日記，接連兩天的教授會就一直在爭論對陸志韋的定性問題。前一天「工作組張大中宣佈昨晚與陸談頗有覺悟，又言陸仍是中國人，僅喪失立場，如遂加以帝國主義分子之罪名，未免過重」。「今日之會，定陸為買辦階級，較帝國主義分子較輕。張大中宣佈陸前夕作函托彼轉致教部請求撤職查辦，有願悔而死，不願死而悔語。」鄧之誠頗不以為然地評論道：「此即所謂覺悟，亦即所謂新材料也。」在他看來，「料教部有批示，故張強謂群眾當盡力幫助陸坦白」。張大中講了話，「翁獨健遂謂罪行大小，應視坦白程度而定，需要群眾多數意見，不需要少數恩怨意見」。但翦伯贊不服，「起而駁翁，謂群眾意見未錯，毋乃文不對題」。¹¹⁵

正是在這種輿論壓力下，燕大黨委雖接受了工作組關於陸是中國人，不宜稱其為「帝國主義分子」的意見，卻沒有接受「買辦階級」這頂帽子，而是把陸、趙、張一併定為「反動分子」。直到毛澤東發話，大家才轉而同意讓陸志韋再做檢討，和幫助他過關，亦即允許他重回「人民」中來。

5 月 13 日，陸志韋交出一份長達 4 萬字的檢討書，詳詳細細地梳理了他和美國人之間的關係，以及說明美國人做事的情況。這時因為院系調整工作開始了，校節檢委一時無暇顧及討論他的檢討，一直拖到 8 月上旬，宣傳部才印發了他的這份檢討書供會議討論。但它在編者按中已明確肯定：「陸志韋對於他一貫的反人民的罪行，是有悔改之意的。」¹¹⁶故 8 月 11 日在有各系教員、學生參加的校節檢委擴大會議上，陸志韋的檢討很順利地通過了，且當晚即在全校師生職工大會上做了宣布。¹¹⁷

¹¹⁵ 鄧之誠，《鄧之誠日記（6）》，頁 37。

¹¹⁶ 《陸志韋的檢討書》（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宣傳部印，1952 年 8 月），頁 1。

¹¹⁷ 〈張大中關於陸志韋問題的報告〉（1952 年 8 月 15 日），收入北京市教育局革命造反委員會宣傳組編印，《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1968），頁 17。

與對陸志韋問題的態度相比，燕大運動各級領導部門對趙紫宸問題的態度分歧更大。在毛澤東 4 月 21 日批示前，趙一連檢討了五次都沒有過關，根本在於工作組明確性「趙紫宸是帝國主義長期培植在中國基督教團體中的重要代理人」，「宗教學院是反革命藏身之地，帝國主義反動分子陰謀活動之所」。¹¹⁸但事實上，具體主管燕大運動的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並不擔心趙紫宸和宗教學院具有怎樣的破壞作用，相反地，他更看重趙紫宸在國際上和在中國基督教徒中的影響。4 月上旬，工作組報告稱，通過忠誠老實運動，發現連同趙紫宸在內的宗教學院總共 30 人中，就有反動黨團骨幹分子 3 人，三青團分子 4 人，問題極其嚴重。他的批示卻是：對趙紫宸要從如何「為我用」這個角度考慮問題，對「宗教學院暫且保留，待通盤研究後再定」。¹¹⁹

在彭真批示及毛澤東批示下達後，燕大工作組及校節檢委自然也改變了對趙的工作方針。8 月中旬陸志韋過關後，他們馬上就專門安排人與趙紫宸談了話。用趙的說法，因為 3 月上旬群眾大會上覺得自己受了冤枉，因此從那時起一直懷著抵抗的情緒。組織上找自己談話時仍「抱著解釋辯護的態度」。但隨後終於有所醒悟，看清了兩件事：一是「政府的寬大」；二是「錯誤在我」。在「下決心分析自己」之後，才開始認識到：「我做美帝工具，自覺自動地用了基督教為它服務，卻以為不是服侍它而是服侍『中國』教會，是用耶穌基督的救法去挽救『中國』人心」。在此基礎上，他逐一檢討了早年與司徒雷登的關係、接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神學博士學位，和做了世界教會協進會六主席之一，以及與何明華等一些中國基督教人士的關係問題。¹²⁰

對於趙的這次檢討，燕大工作組很不滿意，認為趙「檢討態度仍不老實，沒交待新的問題」。但考慮到院系已在調整中，燕大已被拆分，教育部的意見是讓趙紫宸退休了事。而蔣南翔則提出此事應請示彭真，因為他同樣認為，從

¹¹⁸ 〈燕大的教師思想改造運動〉（1952 年 4 月），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2023/3/1-5；《燕京宗教學院情況專報》（1952 年 4 月 4 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215/13/443/19-22。

¹¹⁹ 〈彭真批示〉（1952 年 4 月 18 日），收入北京市教育局革命造反委員會宣傳組編印，《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頁 35。

¹²⁰ 〈趙紫宸檢討書（摘要）〉（1952 年 8 月 29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46023/2/11-15。

統戰工作的角度，仍可考慮用他一下。蔣指出，趙在美、英還有一些影響，去年亞洲和太平洋和平會議的代表還有人提出要見他。也因為趙的問題還要上報彭真決定，並經中央批准，故趙檢討過關的問題之後也不了了之了。

張東蓀很清楚自己最大的麻煩是什麼，在 5 月 7 日主動交出的第四次檢討中，他被迫交代了與司徒雷登、柯樂博以及與王志奇（亦名王正伯）等人的一些往來。但他寫得小心謹慎，且著重於解釋，迴避了他害怕觸及的要害問題。檢討上交後等了三個月得不到回應，這讓他十分焦慮。8 月 11 日，校節委會終於做出回應了，卻是在全校師生職工職工大會上宣布他的檢討和以前一樣仍舊「不老實」。

張東蓀從會場回家後，表現得很慌張，他對身邊人說，中央統戰部「大概掌握了我的材料」了。當晚，他匆匆忙忙寫了一封信，請家人送給翁獨健，內稱：「今日之會使弟十分惶悚，再作檢討如何著筆，亟盼公能抽暇約期一談，俾弟得有所藉助也。拜懇拜懇。」¹²¹接下來，他和太太更是四處托人打探情況，甚至找到梁漱溟，請他去毛澤東那裡時代為說情。¹²²

幾天後，翁獨健按照燕大黨支部布置的口徑與張東蓀談了話，明確告訴他重點是要「好好交待……和美帝國主義的關係」。至此，張東蓀才痛下決心重點交代了他與美國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博，以及與「美國特務」王正伯（又名王志奇）的關係問題。¹²³

¹²¹ 〈張東蓀致翁獨健〉（1952 年 8 月 11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0030/2/2。

¹²² 梁漱溟回憶他受張東蓀太太之托於 1952 年 8 月 7 日見毛澤東時曾代為說情，此日期及所談內容或可存疑。從目前所見檔案資料看，張高度緊張是 8 月 11 日校節委會否定其第四次檢討後的事，且所說求情內容係張通過「一特殊間諜」「為美國務院提供情報」，「此特務被捕，供出其事」，時間亦不合。參見梁漱溟，《我生有涯願無盡——梁漱溟自述文章》（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 331；艾愷採訪，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 230-231。

¹²³ 張東蓀的交代還只是部分的。僅在美國外交檔 1949 年中國卷收錄的電報中，可以看到的張東蓀親自或通過兒子張宗炳向司徒雷登，特別是通過柯樂博向美國國務院介紹中共資訊的情況，前後就有十多次，其中大部分張在檢討中都沒有提到。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pp. 277-278, 350, 357, 364, 376-377, 380, 443-445, 612, 618, 790, 1024, 1263.

張東蓀的第五次檢討是 9 月 6 日完成並上交的，緊接著王正伯即被捕，民主同盟亦很快召開中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張東蓀在盟內一切職務，令其徹底交待，聽候處理」。而中共中央統戰部則遲至兩個半月後才將張第五次檢討印發黨、政、軍、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高級負責人。其指示除要求民盟應將相關情況向其北京市支部傳達外，同時要求「不向其他地方組織作正式傳達」。¹²⁴

事實上，11 月毛澤東在中央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講話時，還是點了張東蓀的名，除強調向美國出賣情報不可接受外，並稱他為「大壞蛋」。¹²⁵

這之後，民盟的態度可想而知。它不僅認定張「是帝國主義奸細分子」、「是美帝國主義派在我們新中國的特務」，決議開除張東蓀的盟籍，而且「提請政府依法處理」。¹²⁶

九、尾 聲

早在燕京大學狂風暴雨到來之前，中共中央就已於 1951 年 11 月 30 日具體規劃好了這場運動的目的、步驟和方法。其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藉助反美的愛國運動和「三反」運動，對長期以來受到資產階級主導的「藏汙納垢」的高等院校展開一場階級鬥爭。其指示稱：「學校是培植幹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機關」，必須「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保持其革命的純潔性」。為此，第一步是要在工作組領導下放手發動學生群眾，充分揭露批判資產階級思想，要求每個教師在群眾面前進行檢討，「『洗澡』和『過關』」，以實現初步的思想改造。第二步是在思想上分清敵我界限後，在公安機關的配合下，「組織忠誠

¹²⁴ 〈張東蓀第五次檢討〉（1952 年 9 月 6 日），附中央統戰部通知（1952 年 11 月 26 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215/18/224/2-12。

¹²⁵ 〈民主人士對張東蓀賣國事件的反映〉（1951 年 12 月 1 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215/13/449/4-6。

¹²⁶ 孫萬國，〈「張東蓀謎案」彌增其謎——敬讀戴晴新書兼與作者商榷〉，《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 113（2009 年 6 月），頁 122-133。

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並準備調整學校領導成分。第三步是在新的領導班子領導下，按照蘇聯教育模式，「準備學校教育改革，包括學制改革、院系改革、課程改革、組織改革等」。¹²⁷

1952 年發生在燕大校園內的這場泛稱為「思想改造運動」的運動，就是按照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的相關指示連續進行的三場運動。從 1 月 24 日開動員會到 3 月下旬結束的，是思想改造運動；從 3 月 28 日動員到 4 月 21 日宣布處理決定的，是忠誠老實、交清歷史運動。之後學校從 5 月 2 日起恢復上課，同時從 4 月下旬起即開始做學習動員院系調整的相關準備。6 月 28 日，燕大按教育部規定正式啓動了院系調整工作，到 7 月中旬確定了調整方案，8 月則開始了一分爲八的拆分大搬家。即「機械、土木、化工調整去清華大學；教育調整去北師大；民族系調整去中央民族學院；勞動系調整去中央勞動幹校；政治系調整去中央政法學院；經濟系調整去中央財經學院；音樂系調整去中央音樂學院，其餘各系調整到北京大學。」¹²⁸

需要說明的是，思想改造也好，忠誠老實也好，院系調整也好，是抗美援朝戰爭背景下中共加速清理改造全國高等院校的一個統一步驟，所有高校概莫能外。然而對教會大學的政策是特殊的。如前所述，1950 年 5 月底毛澤東曾明白講過：「我們是不允許外國人在這裡辦學校的」，因此「教會學校基本上是收回的問題，一定要收回」。¹²⁹但當時的這個「收回」，指的還是燕京大學由私立改爲公立的意思。毛澤東於燕大改公立時爲「新生」的「燕京大學」親筆題寫校名，也說明了這一點。但思想改造連同組織清理任務提出後，從教育部開始，並影響到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在要不要保留教會學校的問題上看法都發生了改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認爲教會學校中「藏汙納垢」，「進

¹²⁷ 參見〈京津各大學思想學習經驗通報〉（1951 年 11 月 17 日）；〈中央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1952 年 11 月 30 日），收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冊 2，頁 526-527。並見張世龍，《燕園絮語》，頁 9。

¹²⁸ 項文惠，《廣博之師——陸志韋傳》，頁 225。

¹²⁹ 〈毛主席和劉少奇對高教政策的指示〉，1950 年 6 月 5 日傳達，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卷 1，頁 149、153-155。

步力量很弱」，「絕大多數的教員有嚴重的親美崇美思想，以帝國主義分子爲恩師好友」，難於徹底改造。此一判斷在工作組把輔仁大學與燕京大學一併作爲組織清理的重點，初步整頓後，更不難證實其政治問題的嚴重性。¹³⁰

根據蔣南翔 4 月 22 日的報告：「在忠誠老實運動中，燕京大學交代問題者 1,529 人，佔全校總人數 89%，其中屬於一般性問題者（如隱瞞年齡、學歷及反動的社會關係等）1,071 人，屬於政治性問題者（如參加反動黨團及曾有反動言論著作等）410 人，屬於比較重大的政治性問題者 47 人（國民黨、三青團及其他反動組織的骨幹分子 7 人，敵僞軍政、憲警的幹部 20 人，參加特務組織者 5 人，爲帝國主義分子進行情報活動者 3 人，曾任帝國主義國家軍政機關官員者 7 人，聖母軍職員 2 人，叛徒自首者 2 人，有血債嫌疑者 1 人）。交代問題者教授 51 人，講師助教 91 人，職員 151 人，學生 1,077 人，工警 169 人。另外，在運動中交出軍刀 4 把，匕首 1 把，照明彈 1 發，無線電真空管 2 支，以及各種反動證件多種。」輔仁大學的情況比燕京大學還要嚴重，全校總人數比燕大少 310 人，交代問題者佔到全校總人數 93%強，屬於政治性問題者達到 500 人，屬於比較重大的政治性問題者 96 人。「在運動中還交出收報機 2 架，發報機 1 架，無線電真空管 11 件，機關炮子彈 5 發，軍刀 2 把，匕首 1 把，聖母御侍團經文多件，以及各種反動證章證件數百種。」¹³¹

多少值得慶幸的是，由於毛澤東對大學知識分子中組織清理的處置方法有過相對溫和的指示，¹³²再加上從統戰的角度，他們對國際輿論的相關報導也還

¹³⁰ 這時的組織清理其實是 1950 年底開始發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一個階段，內部統稱爲「清理中層」。

¹³¹ 〈北京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清理中層工作的經驗〉（1952 年 4 月 22 日），陝西檔案館藏，檔號 123/1/233/15-28。

¹³² 指示稱：查清誰有問題，「基本上不清洗」，「只要瞭解了內部誰有問題，給他飯吃，不怕他們造反」。參見〈趙方傳達中央第四次公安會議決議〉（1951 年 10 月 7 日），四川省檔案館藏，檔號建西/1/16/1-4；梁漱溟，《我生有涯願無盡——梁漱溟自述文章》，頁 331。

比較重視，因此對陸、趙、張的處置問題及其思想、生活等情況還比較關注，故組織處分相對寬鬆。¹³³

陸志韋 8 月過關後就被教育部分配到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去做純文字工作去了。趙紫宸最初被安排掛在北大名下退休並領原薪，後經公安部、教育部、北京市等相關部門研究決定，保留燕京宗教學院，遷去市內，由政府出資，仍讓趙掛院長職。即使是有出賣情報之嫌的張東蓀，也被安排在北大名下退休，薪金照發。當然，三家在燕園的大房子都沒有了，只有張東蓀一度還住在原先的房子裡，但也只能和另一家人合用了。¹³⁴

1952 年 10 月 4 日，受命從城裡擁擠的沙灘紅樓遷來燕園的北京大學，舉行了開學典禮，自此成了燕園的新主人。鄧之誠在當天的日記中不無感慨地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從此燕京成爲歷史名詞矣。」¹³⁵

不過，這並非只是燕大的命運。對外國人在華辦學校，尤其是辦教會學校，毛澤東講得很明白：原則上「不允許」，「要收回」！僅僅是因爲新政府人力財力不夠，才「暫時維持現狀」的。即使維持現狀，也有前提。第一是學校實權必須掌握在政府信得過的中國人手中；第二是這個「外國」不能是敵對國。輔仁第一個被收回，是因爲觸犯了第一條；燕京接著被收回，是因爲其背後是美國差會，朝鮮戰爭使兩國突然間成了敵對國。當然，既然原則已經確定，在中國大陸，所有西方教會學校成爲歷史名詞也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¹³⁶

¹³³ 鑒於英文報刊於運動初就陸續開始關注燕大趙紫宸、陸志韋、張東蓀等人的情況，且時有誤傳，故自 4 月初起燕大工作組負責人張大中就被要求定期向北京市委提供有關三人情況的簡報。

¹³⁴ 〈關於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等人生活問題的情況〉（1952 年 11 月 4 日），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號 YJ52054/2。

¹³⁵ 鄧之誠，《鄧之誠日記（6）》，頁 134。

¹³⁶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見邢福增，〈連根拔起：建國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的終結〉，《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增訂版）》（香港：道風書社，2012），頁 153-216。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北京大學檔案館藏檔案

- 〈1848-1951 年畢業證書存根〉，檔號 YJ48046/1。
- 〈中華基督教全國大會籌備委員會宗教改革組趙紫宸、江長川告北京各教會函〉（1950 年 2 月初），檔號 YJ50005/2/37-38。
- 〈本校教員政治學習委員會名單〉（1951 年 10 月 8 日），檔號 YJ51022/1/24。
- 〈西語系因送謝給柯安喜引起爭辯〉，《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快報》，期 1，1951 年 2 月 20 日，檔號 YJ50029/2/5。
- 〈保衛世界和平反美侵略委員會燕大工會分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1950 年 11 月 15 日），檔號 YJ50029/1/12-19。
- 〈范天祥日記〉，1948-1951，檔號 YJ49021/1。
- 〈紐約聯合托事部執行秘書麥默倫給中國基督教各大學校長的信〉（1950 年 6 月 2 日），檔號 YJ49022/3/18-20。
- 〈紐約聯合托事部關於燕京大學委員會的決議〉（1950 年 5 月），檔號 YJ49022/3/16。
- 〈張東蓀致翁獨健〉（1952 年 8 月 11 日），檔號 YJ50030/2/2。
- 〈教員座談會記錄〉（1950 年 11 月 16 日），《燕京工人》，號外第二號，1950 年 11 月 19 日，YJ50029/2/23-24。
- 〈教員討論會記錄〉（1950 年 11 月 17 日），《燕京工人》，號外第二號，1950 年 11 月 19 日，檔號 YJ50029/2/24-27。
- 〈第三次教職員座談會記錄〉（1950 年 11 月 23 日），《燕京工人》，號外第三號，1950 年 11 月 27 日，YJ50029/2/29-30。
- 〈第廿四小組會議紀錄〉（1951 年 2 月 20 日），檔號 YJ50029/1/1-6。
- 〈陸志韋的檢討書〉（1952 年 5 月 13 日），檔號 YJ49023/2。
- 〈陸志韋致司徒雷登的信〉（1949 年 5 月 31 日），檔號 YJ49022/3/5-6。
- 〈陸志韋給聯合托事部執行秘書麥默倫的信〉（1950 年 6 月 28 日），檔號 YJ49022/3/21-22。
- 〈陸志韋給魏德邁將軍的備忘錄〉（1947 年 8 月 12 日），檔號 YJ49022/1/30-31。
- 〈陸校長的話〉，《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快報》，期 1，1951 年 2 月 20 日，檔號 YJ50029/2/4。
- 〈趙紫宸檢討書（摘要）〉（1952 年 8 月 29 日），檔號 YJ46023/2/11-15。
- 〈學生支部工作科轉報陸志韋送交的美國托事部來函〉（1950 年 7 月 12 日），檔號 YJ50031/1/1。
- 〈燕大反美侵略工會分會宣傳組邀請函〉（1950 年 11 月 20 日），檔號 YJ50029/1/10。

- 〈燕大反美侵略委員會工會分會學習怎樣認識美國第一次漫談通知〉（1950年11月16日），檔號 YJ50029/1/21。
- 〈燕大的教師思想改造運動〉（1952年4月），檔號 YJ52023/3/1-5。
- 〈關於陸志韋、張東蓀、趙紫宸等人生活問題的情況〉（1952年11月4日），YJ52054/2。
- 〈關於燕京反動分子的工作計畫〉（1952年4月18日），檔號 1/6/629。
- 《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罪行快報》，期2，1951年2月19日，檔號 YJ50029/2/5-6。

其他檔案館藏檔案

- 〈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1950年7月23日），上海檔案館藏，檔號 B22/2/1/1-3。
- 〈北京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清理中層工作的經驗〉（1952年4月22日），陝西檔案館藏，檔號 123/1/233/15-28。
- 〈民主人士對張東蓀賣國事件的反映〉（1951年12月1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215/13/449/4-6。
- 〈張東蓀第五次檢討〉（1952年9月6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215/18/224/2-12。
- 〈趙方傳達中央第四次公安會議決議〉（1951年10月7日），四川省檔案館藏，檔號建西/1/16/1-4。
- 《燕京宗教學院情況專報》（1952年4月4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 215/13/443/19-22。
- 《北京燕京大學學生名錄（1950-1951）》，1950年11月印發。
-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室編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記錄》，輯 1-2，1951-1952。
-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檔選集》，冊 18，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冊 1-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冊 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卷 1-3，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中央檔案館編研部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1949-1956）》，北京：學習出版社，1996。
- 中共中央統戰部編，《統戰政策文件彙編》，冊 3，北京，1958。
-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廣東省檔案館編輯，《廣東省土地改革運動史料匯編》，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廣東省檔案館，1999。
- 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卷 2，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2014。
- 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編，《美帝國主義爲了維持燕京這個文化侵略據點在解放前後所進行的陰謀活動》，1952。
- 北京市教育局革命造反委員會宣傳組編印，《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1968。
-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Vol. VI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二、報刊

- 《人民日報》，1949-1952。
《人民教育》，1950。
《大公報》（香港），1951。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燕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新燕京社聯合出版，1951-1952。
《光明日報》1951-1952。
《科技時報》，2004。
《燕京工人》，1952。

三、日記、年譜、文集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卷 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鄧之誠著，鄧瑞整理，《鄧之誠日記（6）》，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四、回憶資料

- 艾愷採訪，耽學堂整理，《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2006。
佚名編，《雄哉！壯哉！燕京大學——1945-1951 級校友紀念刊》，北京：1994。
巫寧坤，《孤琴》，臺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08。
張世龍，《燕園絮語》，北京：華齡出版社，2005。
梁漱溟，《我生有涯願無盡——梁漱溟自述文章》，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燕大文史資料編委會編，《燕大文史資料》，輯 1-1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1998。

五、專著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朱伯崙，《大陸學人浩劫》，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
余英時，《余英時回憶錄》，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18。
巫寧坤，《一滴淚》，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7。
范燕生著（Allen Artz Wiant）著，李駿康譯，《穎調致中華：范天祥傳——一個美國傳教士與中國的生命交流》，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0。
張大中，《我經歷的北平地下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
張世龍，《燕園絮語》，北京：華齡出版社，2005。
陳遠，《消逝的燕京》，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
項文惠，《廣博之師：陸志韋傳》，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 項文惠著，《廣博之師——陸志韋傳》，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輔仁大學校友會編著，《輔仁大學校史》，北京：北京社會出版社，2005。
- 燕京大學校友校史編委會編，《燕京大學史稿》，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9。
- 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編著，《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北京：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編寫組編印，2006。
- 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 West, Philip,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六、論文及專文

- 光未然，〈萬壽山下——北京解放前夕西郊工作日記〉，《北京觀察》，1999年第4期，頁49-50。
- 邢福增，〈反帝愛國與宗教革新——論中共建國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6，2007年6月，頁91-141。
- 邢福增，〈連根拔起：建國後基督教在華教育事業的終結〉，《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增訂版）》，香港：道風書社，2012，頁153-216。
- 孫萬國，〈「張東蓀謎案」彌增其謎——敬讀戴晴新書兼與作者商榷〉，《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113，2009年6月，頁122-133。
- 張德明，〈鼎革前後的博弈與調適——1949年燕京大學的多重面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110，2020年12月，頁111-156。
- 楊奎松，〈一位美國傳教士在燕京大學的「解放」歲月——圍繞范天祥教授的日記和書信而展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頁30-52。
- 鄧陽，〈趙紫宸與燕京宗學院——走向「三自革新」的本色化之路〉，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6年6月。

七、網路資源

- 〈聖誕在燕園〉，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cn/zhuanzhu/2001-10-09/631.html>（2009年8月30日檢索）。
- 雷潔瓊，〈珍藏在記憶深處的往事〉，原載《我們的周總理》，轉見周恩來紀念網，<http://zhouenlai.people.cn/n1/2018/0525/c409117-30014738.html>（2018年5月30日檢索）。

**Elegy for Yenching University:
The “Rebirth” and Disillusionment of an American Missionary University,
1948-1952**

Yang Kuisong*

Abstract

Befor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y seized power, Western Christian groups with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in China were already planning to withdraw from China, but the moderate policy of the CCP in the early days of its entry into the cities left many Christians with some illusions.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50, due to the conflict of personnel rights and the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ver North Korea,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nd Yenching University were successively taken over by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The ensuing political movements such as “thought reform,” “profession of loyalty,” and “organizational clean-up” opened the way for the complete abolition of church universities, the elimination of Western influen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Soviet model.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Yenching University was thrown into the dustbin of history in this context.

Keywords: Yenching University, Christianity, United State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ought remolding

* 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